



2009年10月30日第25期

总第三十五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本期目录

史林一页

[丁凯文](#) 从林彪座机被击落所想到的

[杜钧福](#) “红八月”中的抗暴者

风云人物

[阎长贵](#) 关锋是否被任命过总政副主任

附录：[余汝信](#) 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

[余汝信](#) 关于关锋职务的再研讨

蓦然回首

[马文蔚](#) 难忘的“异类”经历（之二）：牢房日月

[沙漠](#) 孩子，你还记得吗？

忆旧思亲

[徐伟杰](#) 追忆父亲徐韬

[马大观](#) 亲睹徐季元老师之死

[可父](#) 死于武斗期间的几个同学

口述历史

[汤铭](#) 口述 文 靖执笔 造反、偷书看与下放部队农场

简讯

[丁东](#) 于会泳传新版值得关注

编读往来

- 1、[胡泊](#)谈江青的“处长”一职 2、[邱心伟](#)谈本刊的点击率
3、[穆学谦](#)谈感想 4、[庄菁瑞](#)介绍关于林彪堕机的电视节目
-

【史林一叶】

从林彪座机被击落所想到的

丁凯文

友人发来了今年第 10 期《炎黄春秋》上阎明复的文章《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主要是阎明复摘译的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顾大寿（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之一小部分。顾大寿在回忆中讲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其中特别涉及到“九一三事件”，因为顾大寿曾亲赴蒙古温都尔汗实地查看过飞机失事现场，故他的回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阎明复的眼光极为敏锐，一下子就发现了该回忆录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林彪乘坐的 256 号飞机是“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的，阎明复特别将“击落”一词的俄文标示出来，以示郑重。

林彪的座机之所以失事，到底是因为燃油耗尽而不得不迫降，还是遭遇了外部炮火的攻击而导致最终的坠毁。这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林彪事件研究者们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些年来有不少文革研究者投入很大的精力予以辨析、研究。有些研究者经过严肃认真的分析，认为林彪座机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陈晓宁和京城孤魂二位。曾经抵达“九一三事件”失事现场勘察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曾于 2001 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在大漠那边》，孙一先指明，中方通过对飞机失事现场部分照片的分析，得出林彪座机“自行坠毁”的结论。孰是孰非，一时难以定论。顾大寿的回忆为我们解开了这一谜底，林彪的座机确实是被外部炮火击中而导致最终坠毁的。

顾大寿的回忆虽然为我们解开了一个谜底，但是却使我们产生了其他的疑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林彪的座机是怎样被击落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炮火击中了林彪的座机？是地面高射炮火，还是导弹亦或是歼击机炮火？顾大寿的回忆没有回答这一

问题。另外，击落林彪座机的到底是蒙古军队还是苏联驻蒙古军队？顾大寿的回忆亦未曾提及。以常识而论，当时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蒙古国早已是苏联的傀儡，其军事防务也由苏联人控制，主要战略性武器也都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如果说林彪乘坐的飞机被炮火击中，更大的可能性应是苏联人所为，更何况苏联军方人员最先抵达出事现场，并拿走了一部分物品。若非他们所为，何以行动如此之快呢？

(2) 顾大寿亲临“九一三事件”现场进行了观察，他的回忆是：“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死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面去了。后来，为了辨认死者，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顾大寿的回忆中并未给出他们赶赴出事地点的具体时间，根据中方孙一先的回忆，中方人员是在9月15日下午和16日上午两次抵达出事地点的，不仅勘察了出事飞机的残骸，还参与处理了罹难者的遗体，并加以安葬。对照顾大寿的回忆，显然顾大寿到达失事现场应在中方人员勘察之后，否则就不会“什么也没看见”了。我们可以推测，最先抵达现场的苏方人员只对飞机和机上的相关文件感兴趣，所以他们拆走了一台尚为完好的飞机发动机，也许还有飞机的黑匣子。那么这些苏方人员还做了些什么呢？他们之中有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呢？

(3) 根据苏联方面的报道，苏联人在9月某日重返飞机失事现场，重新对罹难者的遗体作了鉴定，原因是他们可能意识到飞机上遇难者中有中国方面的“大官”。据顾大寿回忆，他见到了那些重新被挖掘出来的遗体，但因为难以辨识，只好请示上级机关，在得到答复后，将林彪的头颅带回莫斯科作进一步的鉴定，随后再将死者遗骸重新掩埋起来。最后通过鉴定，在莫斯科得出林彪确实死于飞机坠毁事件的结论。从顾大寿的回忆看，他应属于第二批抵达现场的苏方人员，并非在第一时间勘察该事件，因此无法提供更多的现场真实情况。

(4) 另据顾大寿回忆：“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这一说法十分令人疑惑。首先，孙一先的回忆里未曾提及飞机上发现弹孔。以中方当时与苏蒙关系的状况，中方有理由怀疑有关飞机是被炮火击中而导致坠毁的。孙一先在自己的回忆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他对失事飞机的勘察过程，并注意到机翼某处的大洞，大洞的周围有不规则的铝刺，有

向外翻的，有向内翻的。因此，孙一先怀疑此洞很像是地空导弹打的。然而，经过中方如此认真、仔细的勘察，中方人员竟然没有发现机舱舱壁上的弹孔，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第二，林彪飞机上只有林立果和刘沛丰二人带枪，其他人员除林彪、叶群外，就是飞机驾驶员潘景寅、三位机械师和林彪坐车司机大杨，他们都不太可能随身佩戴枪支。如果机内真的发生了开枪事件，难道是林立果和刘沛丰二人开的枪？三叉戟飞机是全封闭的，林立果和刘沛丰也不可能在飞机内向飞机外开枪，他们要射击什么人或物体吗？虽然也不排除他们开枪威胁、恫吓机组成员。第三，据孙一先回忆，经过认真勘察，中方人员没有发现任何机内搏斗的迹象。事实上罹难者遗体的排列也不支持机内搏斗的说法。此点可参考袁策祥文章《“913事件”中的李文普及其他》（载《百年林彪》）。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所有罹难者的遗体上均未发现弹孔，这么狭小的飞机机舱内如果真的发生了搏斗，且使用了武器，难道所有机上人员都可以幸免于难吗？所以，所谓飞机上“发生搏斗，且使用武器”这一说法十分可疑，还有待更可靠的资料问世才能厘清真相——如黑匣子的出现。

（5）据孙一先的回忆，9月16日和17日这短短的两天时间内，中蒙双方进行了5轮会谈，而会谈的焦点是该失事飞机到底是民用还是军用。蒙方认为飞机由于不明原因试图着陆，从而发生爆炸，并强调该机属于军用飞机。中方则强调该机乃中国民航飞机，因迷航而误入蒙古，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实际上中方在谈判时就已经意识到蒙方的意图，即“目的无非是为了在今后两国的交涉中占据有利地位，假如该机是被苏蒙军击伤而坠落，则可借此推卸责任。”现在我们回头再看蒙方在交涉中的态度，他们心里很清楚是他们击落了该架飞机，如果他们承认那是一架民航客机，他们的责任就极为重大了，所以他们要采取那种态度。问题在于中方为何在后来迅速、主动地配合了蒙方，不经过有关专家实地调查就自己宣称该机属“自行坠毁”呢？这就要分析一下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处理林案的态度与方针政策了。

中国官方在“九一三事件”后仅仅5天，即1971年9月18日，就发布了57号文件，该文件称：“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发布这份文件时中国驻蒙古二秘孙一先等人尚未回国汇报勘察飞机坠毁事件的全过程！这个匆忙发布的文件也丝毫未涉及林彪座机是如何

坠毁的。换句话说，中国官方并未了解清楚整个事件的全部过程，但“叛党叛国，自取灭亡”这一结论已经明确宣告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林彪事件的真实态度和处理该事件的方针政策。

9月21日，孙一先从蒙古赶回北京向中央作汇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并听取汇报。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对失事飞机丝毫不感兴趣，竟然“听着听着闭上眼睛打了一个盹”，而听到汇报有关飞机上死难者情况时却表现出“精神异常贯注，已看不到一点疲劳的影子。”这说明周恩来等中共高层最关注的是飞机上有无留下活口，会不会给中方造成什么麻烦。至于飞机为何飞往蒙古以及是如何失事的，则根本不值得中共高层关注。无论是自行坠毁还是被炮火击中都无所谓了，反正林彪已死，及早下个“叛国投敌、自取灭亡”的政治结论即可。孙一先汇报中提及的飞机机翼上的大洞也不在研究考虑之内了。在听取孙一先汇报不久，周恩来迅速得出了林彪座机“自行坠毁”的结论。可以说，周恩来的结论实际上配合了几天前中央对林彪事件所制定的方针和政策，虽然日后中央又组织一些空军人士组成调查组，对照失事现场的照片和国内三叉戟飞机的原形作调查，那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为周恩来的结论作注脚而已。

中共官方这一“自行坠毁”的结论，可以说是全人类空难史上最不严肃的结论，在没有任何飞行专家现场调查、检验的情况下，只凭若干张照片，就由中共最高层拍板定论，实在太荒唐、荒谬。据孙一先回忆，9月23日中国驻蒙大使许文益向蒙方通报了中方的态度，原本态度强硬的蒙方代表听了中方“自行坠毁”的结论后态度明显软化。最后中蒙双方在索还遗体、遗物一事上竟然也不了了之。虽然，蒙方知道苏联人第二次到达失事现场取走了某些物品而为此故意设下障碍，阻挠中方索还遗体、遗物的努力，但是，中国方面如果在一开始就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设法搞清飞机失事真相，而不是匆匆忙忙下结论在先、敷衍了事的调查在后，那么蒙方很难隐瞒击落林彪座机的事实。由此可见，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更在意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力的稳固，以及如何让死去的林彪为毛泽东承担文革的罪责。至于孙一先等人日后沾沾自喜地吹嘘周恩来如何将“国际问题”轻易地转化为“国内问题”是多么多么睿智，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那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贻笑天下。

【史林一叶】

“红八月”中的抗暴者

杜钩福

1966年“红八月”，红卫兵肆虐京城。在红卫兵的淫威之下，有没有人反抗呢？

第一批反对者，可能是所谓的“小流氓”。准确地说，是些学业欠佳的学生，或是由于家庭贫寒辍学混迹于社会的青少年。由于文革前的“无产阶级专政”已落实到居民委员会，他们活动的空间非常有限，谈不上“横行乡里”。红卫兵杀向社会，首先遭遇的，就是这批人。8月2日，因北京第四十七中学一个学生被红卫兵打了，这个学生的“哥们”，所谓“小流氓”南鹤龄等人进行报复，用刀扎伤了打人的红卫兵，8月13日在首都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参加的大会批斗几个“小流氓”。会后“小流氓”南鹤龄被判处15年徒刑。在他服刑期间，他的父亲和哥哥被红卫兵打死。中央首长参加了这个大会，对红卫兵当场殴打“小流氓”的行为没有制止。（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社2004年版310页，并可参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41页）

8月25日，在北京市崇文门外发生了著名的榄杆市事件。北京女十五中初中的红卫兵到这个地方的一个“小业主”李文波家抄家、打人，将李文波夫妇关在楼上，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在炎热的夏天里，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不堪忍受，执意下楼，被红卫兵打倒在地。李文波和红卫兵理论，被红卫兵拿棍棒殴打。情急之中，他拿起菜刀试图吓跑红卫兵。以后李文波跳下楼，被红卫兵当场打死。但从这些初中女生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来看，他的反抗只是吓唬吓唬人而已。这一事件却被渲染为“资本家行凶杀人”，并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打人杀人热潮。9月12日，李文波的妻子被判处死刑，于次日执行。（王友琴《文革受难者》218页）

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在8月份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

每天被斗、被打。她还竭力检查自己，说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但没想到，更大的灾难不仅降临到她自己，而且降临到她的家人身上。8月26日，十几个红卫兵闯进她家，不容分说将她的丈夫孟昭江、她的儿子孟毅揪到学校，连同她一起，轮番拷打了一夜。次日晨，又和其他被关押的“牛鬼蛇神”一起赶到操场上跑步。已经奄奄一息的老校长一头栽下不省人事。她的丈夫向红卫兵跪下苦苦哀求。这当然不能打动这些红卫兵，反而认为这是挑衅，要拿剪刀给他剪一个阴阳头。孟昭江原来是共产党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看到亲人受到如此残害，自己又受到侮辱，他实在忍受不了了，就上前抢过了剪刀。这下子惹了大祸。人们喊：“右派分子孟昭江造反了！”“反革命分子杀人了！”马上皮鞭、木棒齐下。已经伤痕累累的孟昭江马上倒在血泊里。这帮暴徒又继续将他反绑四肢，吊在单杠上，棍棒齐飞，将脑袋打破，肋骨打折，血流如注。

郭校长从昏迷中醒来，爬向施暴者，求他们不要再打了。这帮灭绝人性的“革命青少年”却喊：“原来你是装死！”两个红卫兵将她拖到一个污水坑里，把她的头往水里按，将这位老校长活活呛死。孟昭江被公安局作为现行反革命拖到拘留所，在水泥地上躺了两天。第三天才送到医院，在走廊上躺了半天后死去。他们的儿子孟毅是学油画的，被分配到北京分司厅小学当老师。当他的父亲被殴打，母亲被溺死的时候，他被捆在室内的审讯柱上，身上淌满了血，无法动弹。他被继续关押了三天后释放，回到家里，发现家中被抄得一干二净，弟妹们也四散逃命去了。妻子也被迫和他离了婚。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被毁灭了。他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又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判处十年徒刑，直到1978年才被释放出狱（《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群众出版社1981版）。这就是他的父亲，为保护自己的亲人的一个试图反抗的动作所付出的代价。

同期在师大二附中发生了一个类似事件。被指控的人名叫曹滨海，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三的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是中共铁道部党校的一个干部，受到文革冲击。樊希曼曾经给儿子写过一封信，谈及文革。这封信被班里的红卫兵看到，他们说是“反动信件”。1966年8月25日上午，李文波被抄家的同一日，曹滨海班里的红卫兵到曹家抄家。抄家的过程中，曹滨海和他们发生争执。据红卫兵说，曹滨海在厨房里抓起菜刀砍伤了一个来抄家的红卫兵。曹滨海当时就被抓到公安局关了起来。他的母亲樊希曼则被抓去学校。当天下午，

在师大二附中校内一个砌成的乒乓球台上，这位母亲被打死。同一天在校内被打死的，还有这个中学的语文老师靳正宇和学校负责人姜培良。靳正宇、姜培良、樊希曼三人，跟李文波在同一天被打死。

母亲樊希曼被打死后，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又筹备在 8 月 28 日召开十万人大会，在会上把儿子曹滨海当场打死。周恩来召见了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头进行劝说，结果十万人大会没有开（可参见《记忆》2009 年第一期赵文滔《史无前例的打人风与八宝山火葬场》中对此事的记述）。但是几天之后，8 月 31 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这所中学的几个红卫兵头头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在当时是极大的光荣。曹滨海的母亲被打死了，他自己被关在公安局中未被打死，但是从此精神失常。（王友琴《文革受难者》79 页）

以上三个被迫害者试图反抗的例子的共同特点，都是和家人在一起时发生的。在前两个例子里，“资本家”李文波和“右派分子”孟昭江，如果他们自己面对强权，也许会逆来顺受，甘受杀戮，但是他们在面临亲人受到野蛮对待或濒于危险时挺身而出，予以呵护，从而在最严峻的生死关头尽到了一个丈夫的责任，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生命的惨重代价。

我们在回顾文革的时候往往感叹于世道的败坏、道德的沦落、人性的丧失，但我们也应看到，“在一一场一场的浩劫之中，可敬的，是那些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仍旧维持了人性尊严的人，悲壮的、伟大的，是这些人的生与死，痛苦与挣扎。”
(龙应台《让艺术的归艺术》，《读书》1988 年 6 期)

我们应像纪念遇罗克、张志新一样地纪念李文波、孟昭江。他们演绎了我们这个严酷时代悲壮的爱情或亲情故事。无论多么罪恶的势力都无法泯灭他们身上闪烁的人性的光辉。作家们应该写出像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的作品，使他们的英名永存。

【风云人物】

关锋是否被任命过总政副主任？

阎长贵

余汝信先生在《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一文中明确论定关锋“无正式任命为总政副主任”，他除引用了一些文献资料外，还引用了关锋本人 2002 年 5 月 13 日致友人信。关锋在这封信中说：“66 年 12 月 27 日我骤然发高烧，住进 301 医院，67 年 1 月 10 日稍后病愈出院。在此期间发生了事先没有预计（当然也没有毛主席的指示）的两件大事：一是张春桥在上海夺权；一是打倒了陶铸、打倒了刘志坚——总政副主任（副主任好几位，刘是身强力壮做实际工作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我出了医院之后就有人给我传达：林彪向毛主席提议要关锋作总政副主任，毛主席同意，并说‘不要《红旗》，也得要军队’（这个说法实在令我吃惊！）我听后甚为震惊，我坚决认定我不能做这个工作：（一）我在军队工作时间很短，只作过连指导员，毫无军队工作经验，且当时已知部队高干之间的关系甚为复杂，军事院校的红卫兵最为难缠；（二）所谓三军（空军、海军、北京军区）反总政主任萧华之风甚为激烈，风暴之前兆已经出现，加上毛主席说什么‘不要《红旗》，也得要军队’，我去了总政，如何与萧相处，我绝对不能卷入反萧或保萧浪潮中去。1938 年夏萧华带挺进纵队到达我们冀鲁边，那时他是司令兼政委，确是文武全才，我做乐陵县委书记时同萧有所接触（挺纵司令部驻乐陵），对之印象甚好。……经过慎重考虑，我写了报告给毛主席，坚决不干，理由当然只能是以我的经验、能力做不了这个工作。大概是考虑了我的意见，没有下让我作总政副主任的命令，但是要我作新成立的由徐向前作组长，萧华作第一副组长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之一，并登了报。副组长很多，我是副组长之一，似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实际工作担当，但实际上毛主席要我把《解放军报》管起来，这是实打实的担子，担子实在不轻。可我再不能推辞了——也得知毛、林并没有放弃要我当总政副主任的想法，还拟经过一个过渡，要我去做总政副主任——当然这也没有对我明说。管《解放军报》，我只是管版面的重大新闻，审阅社论、评论之类，不管报社的运动，从管军报以来我一次也没有到解放军报社去过。……后来‘三军’掀起反萧浪潮，大概‘三军’看到我不实际支持他们，所以就说我偏袒萧华、保萧华了。7 月份，萧华倒了，我也倒了。”

余先生所引用的组织文献资料姑且不论，而对关锋这封信我有点狐疑。不知道关锋为什么这样说？真的是实话实说，还是有什么隐情？

对于关锋是否被任命过总政副主任这件事，余先生所说和关锋本人所说，与我曾有过的经历和印象不同。我的印象是：有任命，但他未到职。

文革中和文革后我都问过关锋这件事。文革中，关锋跟我说：去当总政副主任，我能力不行，更重要的萧华是主任，在过去他曾是我的上级，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去了不好开展工作。文革后，我问他，总政副主任你没到职，是不是主席不同意你去？他说：“不！”主席说了：“我宁可不要《红旗》，也要军队。”

1967年夏天，戚本禹要我问问江青：“关锋为什么还不到总政任职？”当我问江青时，她告诉我：“总政去不得，总政是个烂摊子，去了就拔不出来了。”我把江青这个答复告戚，并认为这是江青保护关锋。

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不止一次地说：

“时间记不太清楚了，大约是1966年末或1967年初，我在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值班室看到一个文件，是关于任命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文件；发文单位好像是军委或总政治部，可能是在同一文件中还列了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排序名单，关锋排在几位副主任的中间位置。

“看到这个文件后，我去钓鱼台十五楼办什么事，和关锋谈完了，顺便我就问他，现在任命你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文件发下来了，你该去到任啊！是不是应该在总政先设个办公室处理一些军队方面的问题，像文件、电报、信件之类总要专人处理啊！关锋显然已经知道对他的任命，便说：‘是啊！可在总政设办公室，没有合适的人啊！我这里只有小瞿（指瞿怀明，关锋的秘书）一个人，他离不开，怎么办啊？看看再说吧！’

“关锋没有提出让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安排在总政治部值班的秘书。后来，关锋没有再提这个事，我也没再问。”

王广宇还说，我记得当时办公室收到有关军队方面的文件都要送关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议论，关锋衣帽不整，没点军人的样子，怎么能到总政任职啊？！——关锋确实不修边幅，有点邋里邋遢。

关锋致友人信中讲“……从管军报以来我一次也没到解放军报社去过。”王广宇说这也不是事实。我亲自经历过的就有一次。1967年1月中旬或下旬，某

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冲击解放军报，陈伯达就是派关锋去处理的，我和矫玉山（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瞿怀明陪着他去。关锋到解放军报后，动员和劝说军事院校的红卫兵退出解放军报，有人不听劝，坚决不退出，很猖狂，他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场商量决定抓了几个带头的人，关锋怎么连这件事也没有记忆呢？

余先生举王力关于这件事情的说法“先后不一，拐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做根据。王力究竟是怎么说的？按照余先生的引述，王力曾在写于 1987 年 9 月 25 日的“澄清其他几个问题的真相”一文中称，（1967 年 1 月）“这时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唐平铸、胡痴是成员；关锋是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林彪委托关锋管《解放军报》”。（王力《现场历史 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4 页）四年后，王力在“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中却有截然相反的另一说法：“林彪原来要关锋当总政主任，主席也同意，陈伯达说红旗杂志离不开。主席批了：‘要解放军，不要红旗。’但要征求其他人意见。当时，只有我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关锋不适宜担任这个工作。解放军这么多人，还找不出一个主任？这会伤部队同志的心。再说萧华并没有打倒，可以保。虽然关锋另有长处。主席同意我的意见”。（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90 页）王力“先后不一”的说法显然并不能证明关锋“无正式任命为总政副主任”，我认为，它倒证明了关锋当总政副主任有“正式任命”，但实际并未到职。

作为“中共公开出版物提供的信息”，我也提出两份资料：

其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84 页载：（1967 年）1 月 8 日 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其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 页关于关锋的“注”：“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

这两个相当权威的文献这样说关锋的根据在哪里？他们大概不是也不会是凭空而说吧！再说，《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出版在前（1991 年），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出版在后（1998年），在这件事情上，如果前者说得不对，后者应该改正，为什么没改和不改呢？

如此等等，都需要做出合理说明。我认为，关锋是否被任命过总政治部副主任这件事恐怕还需要更权威的材料才能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

附录——

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

余汝信

众所周知，关锋在1966年5月至1967年8月间，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而在此期间，他有没有兼任过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却众说不一。

一、刘志坚、王力的说法

刘志坚，文革期间的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1967年1月改组前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曾在其回忆录中提到：“1966年冬，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曾多次说过：‘关锋、戚本禹为什么不可以当总政主任、副主任？’1967年1月4日，在我被打倒、关押以后，中央和军委并未经过讨论下达命令，江青个人告诉林彪一声，就宣布关锋为总政副主任。”（刘志坚《风雨征程》，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270）

王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曾在写于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的“澄清其他几个问题的真相”一文中称，（一九六七年一月）“这时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唐平铸、胡痴是成员；关锋是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林彪委托关锋管《解放军报》”。（王力《现场历史 文化大革命记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74）四年后，王力在“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中却有截然相反的另一说法：“林彪原来要关锋当总政主任，主席也同意，陈伯达说红旗杂志离不开。主席批了：‘要解放军，不要红旗。’但要征求其他人意见。当时，只有我提出不同意见。我说关锋不适宜担任这个工作。解放军这么多人，

还找不出一个主任？这会伤部队同志的心。再说萧华并没有打倒，可以保。虽然关锋另有长处。主席同意我的意见”。（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页990）

二、关锋本人的说法

去年中，隐迹潜踪钻研先秦诸子、誓言再不谈文革往事的关锋，应友人的恳切请求，破例地道出了事情的原委：“66年12月27日我骤然发高烧，住进301医院，67年1月10日稍后病愈出院。在此期间发生了事先没有预计（当然也没有毛主席的指示）的两件大事：一是张春桥在上海夺权；一是打倒了陶铸、打倒了刘志坚——总政副主任（副主任好几位，刘是身强力壮做实际工作的）、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我出了医院之后就有人给我传达：林彪向毛主席提议要关锋作总政副主任，毛主席同意，并说‘不要《红旗》，也得要军队’（这个说法实在令我吃惊！）我听后甚为震惊，我坚决认定我不能做这个工作：

（一）我在军队工作时间很短，只作过连指导员，毫无军队工作经验，且当时已知部队高干之间的关系甚为复杂，军事院校的红卫兵最为难缠；（二）所谓三军（空军、海军、北京军区）反总政主任萧华之风甚为激烈，风暴之前兆已经出现，加上毛主席说什么‘不要《红旗》，也得要军队’，我去了总政，如何与萧相处，我绝对不能卷入反萧或保萧浪潮中去。1938年夏萧华带挺进纵队到达我们冀鲁边，那时他是司令兼政委，确是文武全才，我做乐陵县委书记时同萧有所接触（挺纵司令部驻乐陵），对之印象甚好。（注：关锋原名周玉峰，1933年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1939年后任中共山东鲁北地委宣传部长，冀鲁边区〔渤海区〕

二地委宣传部长）……经过慎重考虑，我写了报告给毛主席，坚决不干，理由当然只能是以我的经验、能力做不了这个工作。大概是考虑了我的意见，没有下让我作总政副主任的命令，但是要我作新成立的由徐向前作组长，萧华作第一副组长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之一，并登了报。副组长很多，我是副组长之一，似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实际工作担当，但实际上毛主席要我把《解放军报》管起来，这是实打实的担子，担子实在不轻。可我再不能推辞了——也得知毛、林并没有放弃要我当总政副主任的想法，还拟经过一个过渡，要我去做总政副主任——当

然这也没有对我明说。管《解放军报》，我只是管版面的重大新闻，审阅社论、评论之类，不管报社的运动，从管军报以来我一次也没有到解放军报社去过。……后来‘三军’掀起反萧浪潮，大概‘三军’看到我不实际支持他们，所以就说 I 偏袒萧华、保萧华了。7月份，萧华倒了，我也倒了。”（关锋致友人信，2002年5月13日）

三、中共公开出版物提供的信息

1、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自文革初期至总政机关瘫痪、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取代总政的领导期间（1966年5月—1967年11月）的总政副主任是：

刘志坚（1966. 5—）

徐立清（1966. 5—）

梁必业（1966. 5—1966. 5）

傅 钟（1966. 5—）

袁子钦（1966. 6—1968. 2）

刘西元（1967. 6—）（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附卷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页10、166）

上述副主任中，梁必业1966年5月上旬已被撤消本职，贬任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未到职）；袁子钦1966年6月由总政干部部部长擢任总政副主任，1968年2月去世；刘西元1967年6月由总政青年部部长擢任总政副主任。上述各人除梁必业外，均在1967年间先后被打倒靠边站，但并无正式的免职命令。

上述名单中没有关锋的名字。

2、根据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发布的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为：

组长：徐向前

顾问：江青

副组长：萧华 杨成武 王新亭 徐立清 关锋 谢镗忠 李曼村
组员：王宏坤 余立金 刘华清 唐平铸 胡痴 叶群 王峰 和谷岩 张
涛（《人民日报》1967年1月13日）

在副组长名单中，关锋的名字排在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之后，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之前。小组成员共十八人，除江青、关锋两人外，其余全为现役军人。

四、简要的辨析

①有关说法，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一是有林彪的提议；二是有毛泽东的同意；三是《人民日报》公布的改组后的军委新文革名单，关锋名字的排序变化让人引起揣测（在以往公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中，关锋排名于谢镗忠之后）。但实际上，关锋本人的说明是言之有理、令人信服的。根据中共的正式出版物与关锋本人回忆相互印证，可以肯定，关锋并无正式任命为总政副主任。

②刘志坚说，在他被关押以后，“中央和军委并未经讨论下达命令，江青个人告诉林彪一声，就宣布关锋总政副主任”。此一说法，语意不清晰不说，且非本人亲身经历，仅据传闻又未加核实。刘到底是想说“并未经过讨论即下达命令”呢，还是想说“并未讨论及下达命令”？在“江青个人告诉林彪一声”之后，是江青本人还是让林彪去“宣布”此事？如果是“并未经过讨论即下达命令”，那么，在中共后来的正式出版物中应有反映；如果是“并未讨论及下达命令”，那么，口头的“宣布”有效吗？况且，即便是文革期间，不经过毛泽东的同意，林彪有权任命总政领导人吗？

由于刘志坚在文革前期及文革之后所处的显要地位，人们往往对其所言未经思虑而深信不疑。回忆录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此为一绝好例子。

③王力在数年间对此事先后说法不一，拐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前一说法固然是不经考证，顺手拈来；后一说法，明眼人一看则无非是意图拉近自己与领袖的距离，很有踩低别人、抬高自己、处处邀功之嫌。

关锋担任总政副主任固然未成事实，但王力后一说法的不可信处在于：其一，依王力所说，林彪不是要关锋当副主任，而是要当“总政主任”，要其取萧华而代之；其二，以毛的性格，绝少决定了的事会再去“征求其他人意见”，而且是

仅因听信了王力一人的意见即改变主意！如果毛对王力如此言听计从，那还有大半年之后的“王关戚”一说吗？

以笔者管见，王力回忆录涉及的历史材料不可谓不丰富，当有值得治史者垂注之处。但上述一事前后两说的例证，提醒阅读者不可不倍加小心，提防中招，对他的回忆录所提供的说法，必须以其他文献、档案资料比照、分析、佐证之。

2003 年 10 月

原载网络刊物《枫华园》第四二四期，2003 年 11 月 14 日。

【风云人物】

关于关锋职务的再研讨

余汝信

《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是笔者写于六年前的一篇短文。最近，阎长贵先生对该文的结论——关锋“无正式任命为总政副主任”提出异议，认为根据他本人和王广宇先生的印象，是“有任命，但未到职”。

阎长贵先生的不同意见，是一件好事，为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再次阐述自己的观点创造了一个机会。惟笔者依然认为，关锋的回忆与事实真相是相吻合的，而阎、王两先生的回忆应有误差。

关锋回忆道：“没有下让我作总政副主任的命令，但是要我作新成立的由徐向前作组长，萧华作第一副组长的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之一，并登了报”。

对关锋的话，应回到 1967 年 1 月时的大环境去判读。此前，自 1966 年 10 月 5 日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后，总政及其下属的全军文革小组，对于军队内部尤其是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已越来越难于驾驭。“各地军队院校学员到京冲击军事机关的行动愈演愈烈”（刘志坚语）。1967 年 1 月 4 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萧华多少也被牵连，总政领导全军文化大革命的威信已荡然无存。如果此时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他一介书生，有能力、有威信去扭

转这一被动局面吗？毛、林不是傻子，关锋一个人单枪匹马去上任，能起什么作用？

由于总政武功已废，毛泽东决定另起炉灶，成立一个更高规格的机构，以取代总政，统领全军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由徐向前挂帅的新的全军文革小组应运而生的根本原因，而这决非是派关锋一人去改造总政就能达致目的的。

1967年1月12日，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的消息见报。该消息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军委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发出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全文如下：为了加强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并经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立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现将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公布如下……”（名单前文已有，此处略。载《解放军报》1967年1月12日第一版）

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比起原总政下属的全军文革小组规格高得多。组长徐向前是军委副主席；军委副秘书长、总政主任萧华，只是副组长之一；副组长中，加入了军委副秘书长、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王新亭，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关锋；中央文革小组组员、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和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则属于“留任人员”。甚至林彪的夫人叶群、代表海军的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代表空军的余立金（空军政委）也都才是组员。

自此，三座门（军委文革小组办公所在地）取代了旃坛寺（总政机关办公所在地），天天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阎文引述了王广宇先生的回忆。以笔者愚见，王先生的回忆多半是将全军文革小组和总政两个机构混淆了；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与总政副主任两个职务混淆了；将军委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误记为是“关于任命关锋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文件”；将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的名单，误记为“还列了一个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排序名单”。王的模糊记忆中唯一没有错的是，关锋确实排在名单的“中间位置”，但这决不会是总政副主任的排序名单（如果退一万步说真的只是任命关锋一人，按发文惯例不可能将全体总政副主任名单再列一遍，没有必要这样做），这只能是新改组的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名单。

阎文关于关锋衣着的批评，其实到了 1967 年 1 月再议论是没有必要的。自 1966 年“八一八”毛泽东建国以来首次穿军装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公开场合已经大多以一身军装示人。即使关锋 1967 年 1 月有新的军内职务（笔者认为是全军文革副组长，阎、王认为是总政副主任），他也不是第一天才穿军装。

至于关锋说“管《解放军报》，我只是管版面的重大新闻，审阅社论、评论之类，不管报社的运动，从管军报以来我一次也没有到解放军报社去过”，应理解他的意思是没有到报社去上班、没有管报社的运动就是了，不必拘泥于他是否一次都没有去解决过上头交下的任务。关锋的意思是说一天也没有去上班，这大致是没有什么错的，李讷（肖力）正在那里造反造得欢得很，关锋要是不笨，还不躲着她！

关锋说：“7 月份（笔者注：准确地说应是 7 月份之后）萧华倒了，我也倒了”。其实不光是萧华、关锋倒了，连总政也瘫痪了，全军文革小组也不起作用了。8 月份，他们全都被军委看守小组（后来的军委办事组）所取代。

阎先生谓对笔者所引用的组织文献资料“姑且不论”，笔者倒认为，在引用文献资料对史实进行判断分析过程中，官方的组织史资料往往比其他文献资料来得准确。

笔者在《关锋当过总政副主任吗？》中引述过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以证明关锋的名字没有列在文革初期的总政副主任名单中。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编纂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军队部分，资料来源于非公开出版的、总政组织部编纂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笔者引述部分，还可见于该套资料（共六卷）的第四卷（北京：长征出版社 1995 年版）49 页和第五卷 38-39 页。总政组织部编的资料，总不至于将总政自己领导人的任职情况都弄错。还应说明的是，该套资料对于有任命而未到职者都列得很清楚，换言之，如关锋是有任命而未到职，也应列上，而资料中没有他的名字。

阎先生文中提及的两本“相当权威的文献”中有关关锋的信息，笔者认为均有误。试分析如下：

其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提及（1967 年）1 月 8 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1、根据惯例，当时的军委常委会议是须按开会日期顺序编号的。据有关资

料，1966年11月30日召开第59次军委常委会议，1967年3月6日召开第60次军委常委会议，中间并无所谓1967年1月8日军委常委会议的记录。

2、根据当时的干部任免程序，总政副主任这一级别的干部任免，应由军委常委审核、请示林彪和军委各位副主席、常委批准后再报中央（笔者注：即指毛泽东）批准，并不是林彪一个人宣布即可任命的。

其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关于关锋的一个注释。该书的注释，部分颇为粗疏，尤其是有关军队干部的注释，错处甚多，不足为据。除关锋的这条注释外，第十三册注释错的还有：

1、53页，“肖力，即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原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肖力造反后所任职务不是总编辑，而是临时总编辑小组组长（见《中国共产党中国人

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以下简称《资料》]第五卷47页）。

2、116-117页，“彭德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期，军委只设主席、委员，没有设副主席，彭仅是军委委员（《资料》第四卷6页）。

3、290页，“苏振华，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苏仅为军委委员，不是常委（《资料》第五卷3页）。

4、302页，“原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杨勇，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廖汉生为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政委李雪峰），杨勇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长一职早已免去（《资料》第五卷151页）。

5、355页，“叶飞，……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时福州军区司令员是韩先楚，叶飞仅任政委（《资料》第五卷273-274页）。

6、360页，“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当时”是指1973年8月，然而军委秘书长一职自1969年4月“九大”后早已取消，叶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资料》第五卷5、8页）。

2009年9月

【蓦然回首】

难忘的“异类”经历（之二）：牢房日月

马文蔚

失去姓名的人

那人一身蓝，枯瘦的脸。偶尔抬头一瞥，目光凶狠锐利。随身带来的物品：手表、小刀、钢笔等，登记后放入一个大牛皮纸档案袋。他拿起那本《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犹豫了一下，迅速翻看有无夹带，递我说，拿着吧，一般不让带进去。他宣布纪律：你代号为“2261”。在里面不许用姓名。互相不许谈案情。

跟着他在漆黑的院子里走了好一阵，进入一道门。然后是一条昏暗的室内走廊，约一米五宽，一边是窗一边是间隔整齐的房门。他停在一道门前，啪地打开门上与人眼高度相当的长方形小门，向里张望。然后开锁、拉拴，铁器摩擦碰撞声尖利刺耳。“嗡——”一声低沉的吼叫，那扇门开了。他示意我进去。刚要进门，脚被挡了一下，才发现门槛出奇地高，而门框又比通常的低矮。我个子不高，却要低头、提腿，把身子弓成虾米状，才能顺利进门。现实的体形教育告诉你：进得此门来，不再有挺胸抬头的权利。

刚刚站稳，身后又是一连串刺耳的响声，门锁了。这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震动、回响，给我留下极深的记忆。

与昏暗的走廊恰成对比，屋里亮得刺眼。空气很差，有股烧火墙的煤味，混合着各种不干净的气味。很像北方小镇的旅社、大车店。门对面是窗，右侧两张铺板床，左侧一张。右侧靠门的一张已睡人，盖一床绿军被。里面一张，光床板上铺着黑里黑面、脏得油光锃亮的薄被，看来是为我预备的。我将它横着一折，兼作被褥。书包当枕头，这一夜就合衣而卧吧。上床前，习惯地去关灯，没找到开关。门上小方孔半掩，有人在监视。我忽然明白了，对那个看不见的人说：“可以关灯了。”“不用你管！”一声喊叫，使我陡然清醒，这里是监狱，我已失去自由。我没有姓名，我只是“2261”号。我的一切尽在别人掌控之中。

鞋也没脱，跨上床去。躺了一会儿，灯熄了。

低哑的铃声把我吵醒，窗已透亮。六块毛玻璃，窗框内用铁条封死。“铁窗”云云，就是这回事了。同屋那人说该起床了，我一骨碌跳下床，她还在一层层穿衣服。约二十二三岁，短辫、微胖，一身色气不正的军衣。她讲了早晨的程序：

放风、洗漱、早饭。好在一切都很慢。放风时发现，所有牢房都被走廊连接起来，像一座规整的小城。耳边不断响起开关门声，却看不到一个人。洗漱很简单，门开后，将脸盆、牙具排放在门槛内，外面有人提桶哗地一倒，或多或少，一天的用水都在内了。伸手一试，冰凉。早饭是从小方门递进来的。两个粗瓷大海碗，一碗底黄豆咸菜，大半碗小米粥——非粥非饭，当地叫“稠粥”的那种。吃不到一半，再也咽不进去了。她那边吃得很香。她劝我多吃，不然会饿。我问午饭是什么，她说就两顿，下午四点。俩窝头一碗菜。她说刚来时都吃不下，呆长了会不够吃。

饭后，看守来问，我的衣服被褥找谁要，让他们送来。然后就死寂一般再无声响。两个人对坐很无聊，我说：“听你口音是陕西人。”她说是。“军人？”摇头。她看看小方门，又专心听了一会儿，确定门外无人，轻声说：“河西公司的。”原来是一家著名的军工企业。其造反派叫“八一八”，在社会上很活跃。“你这么年轻，能有什么事呢？”她瞥了一眼小方门，更轻声地说，是在报纸上乱写了些字，人家给凑成个反动标语。“你承认了？”“没。后来朋友劝我，说承认了吧，承认就没事了。我承认了。”“男朋友？”点头。“完了就来这儿了？”点头。“唉，怎么能瞎承认！你朋友也是……”她头低到胸前，十分懊悔。

下午很早就听到锅碗勺碰出的响声。晚饭是一碗粘乎乎的烩菜，一个长形的馒头。她说，今天是年三十，这就是年夜饭了。人家早早送完饭，好回家过年。她一说我也想起是过年，但年不年的，早已没有了感觉。饭后天还很亮，就这么干坐着，不由得想起家人。我自己怎么都能豁出去，就是不放心父母。他们老了，理解不了当下的事。姐姐姐夫都在七机部，那里也分两派。不知能否回家和老人一起过年。工作以后，我每月寄钱给老人。只有继续寄，才能使他们不发觉、不担心。现在，我的存折和一点点零钱都被收走了，往后怎么办，尚不清楚。过去有信件往来的同学和朋友，早在文革开始就不再联系，因为我很难说清自己。现在倒省心了。

陕西姑娘闷闷地坐着。我问她家乡过年的习俗，听来也和北方其它地方相似，饺子蒸馍之类，直吃到正月十五。只是初二的面多些花样，揪一小块面，往草帽辫上一按，印上花纹，成了带花面片。简单的生活，也可以很有情趣。

当晚，我的被褥、用品送来了。自己的被、枕头、枕巾，才分别一晚，摸着

它们无比亲切。总算可以告别那床黑脏被了。脱了衣服，睡在自己的被里，从未有过的柔软、舒服，很快睡着了。

“咔啦！嗡——”惊心动魄的开门声把我惊醒，下意识地坐起来、披上衣服。看守站在外面喊：“你（指陕西姑娘）！起来收拾东西！”趁牢门微微合上，我小声说：“是放你出去吧？”她胡乱卷着铺盖，借机扭头对我说：“哪有夜里放人的？”抱起东西往外走，绿棉袄在门缝处一闪就不见了。灯亮着，门也没锁，半天没动静。我躺下接着睡。一会儿，进来一个中年妇人，精瘦。迷迷糊糊听见她细声细气和看守说着什么，又睡着了。就这样度过了狱中的最初二十四小时。

一家三口同狱不能见面的“16号”

半夜搬来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女人，编号16。对起床、放风这一套很熟练，估计进来时间不短了。她身量矮瘦、衣着破旧、脸色黄白，但总体感觉很“洋气”。五官轮廓鲜明，眉骨高而直，嘴薄而阔，下颌瘦削，脖颈坚挺。长发随意在脑后绾一高高的发髻。起身、走路，头微微昂起，像受过形体训练。短袄略显肥大，袖口已磨破。核桃扣中式蓝布罩衣洗得发白，褪色的哔叽西裤掖在半高腰马靴里。马靴很小巧，黑色翻毛、半高跟，新时一定很漂亮。眼下鞋头已破，鞋跟歪斜，像一对小残疾。而主人穿上它，披一件大衣，将领子竖起，走起路来还是很神气。我猜她是文艺工作者。

她问我从哪来，我直言相告。又问电台有没有一个瘦高个儿南方人，高鼻梁、戴眼镜、有些口吃的。“造反派？”“当然！我们就是他抓的。”她说，印象太深了。眼光发蓝，从镜片后面盯着人，让人发瘆。像我们“三家村”的“村长”，但未经证实不便相告。电台造反派也能在外单位抓人，是大联合的“功绩”。

监狱里什么都简陋、匮乏，唯有一样东西有富余——时间。除了放风、吃饭、睡觉，就呆着。“互相不许谈案情”——这是我们最关心的、生死系之的大事，岂能不谈？只是小心别让外边听见，别惹麻烦。现在只有两个人，谈话比较方便。她陆陆续续谈了自己的情况。

我猜对了，她属内蒙文化局系统，在二人台剧团任编剧。她告诉我姓名时，见我没反应，有些奇怪。也许她是文革名人，而我长期与外界隔绝，无从知晓。她女儿是呼市二中的学生（二中是当地名校，犹如在北京说四中）。二中里，头

头脑脑的孩子较多，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活动很活跃。她女儿也是积极分子，到处讲演。但她哪里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同，属于“不准革命”一类。父亲因历史问题被揪，她也被昔日的红卫兵战友们关押、批斗。她不服，伶牙俐齿地和他们辩论。挨打，尿血。当妈的也曾到内蒙古党委为女儿讨公道。随着运动的深入，“历史反革命”被抓，母女俩成了反革命家属。她俩不服，偷跑到北京上访。只有一点点钱，成天混在各地来京上访的人群中，吃苦受罪不说，还须提防被人认出来，是怎样一种惶惶然！果然，不久被呼市的红卫兵逮住，就地关押了几个月，最后押回内蒙，草草批斗后，送至此处——又已三个多月。女儿是一起抓的，可能也关在这里，没见过面。丈夫被抓走后音讯全无，不知在哪里，是死是活。一个家就这样拆了。“我们招谁惹谁了？”（普通话里夹一些天津味儿。）说到伤心处，她总以这句话表达不解和气愤。就这样，折腾了一年多没回家，难怪衣服破旧，人也瘦弱疲惫。

她丈夫有多重大的历史问题，不清楚。她俩被株连，肯定是冤枉的。她说话很慢、很轻，发现小门缝有刺刀闪过，马上停止。说到女儿，有时叫“小家伙”，有时用动作，将拇指和食指张开，在耳后一比，做成一根短辫样子。

对我有所了解之后，她才告诉我，女儿就在这里关着。通过一个站岗的小兵，她们互通消息。当然是最简单的，身体如何，有没有病倒。有一次那小兵露面了。他开小门很轻，那是一张非常年轻的庄稼人的脸。唇上有些茸毛，算不得是正经胡子。他很紧张，脸憋得通红。16号也很紧张，尽可能靠门近一些，打着手势。我的位置，在16号背后，面对着小兵。我赶紧转身面向窗外，给他们一个后背。过后她说，小家伙肾不好，怕她挺不住。小兵一来，多少放点心。当时，小兵这样做很冒险，我为他的善良和勇敢敬佩他。他只来过两次，以后再没来，也许换防了——但愿没事。

刚来时，每天盼着提审，想尽快把事情说清楚。有一次忍不住，问看守：“怎么还不提审？怎么没人管？”看守见多识广，说，到时候自然有人叫你，没人来，就呆着，急什么！16号说，她来这么久，还没提审过一次呢。看来得有长期准备。我向看守打听到，每月可以给家里写一封信，内容尽量简单，经他们检查后发出去。工资已停发，寄钱可用存款，自己填单子（太好了！）。狱中伙食费，每月八块六；买生活必需品，可写条子交看守，将来出去了再结账。

时间长了，我和 16 号也聊些别的事。我问她为什么在二人台剧团，她是天津人，又不是西部人。她说曾换过几个单位，作为编剧，差别不大。二人台的基础是爬山调。和陕北信天游差不多，爬山调也是很美的民歌，善用比兴。比如：“长城上跑马调不回个头，思想起包头我就心里抖。”（用当地话，“心里”念作“心 her”）“摘一根豆角抽一根筋，为一回朋友伤一回心。”信天游，我喜欢；爬山调，经她一说，我也喜欢了。爬山调是唱的，当地人不说“唱”，说“吼”。她还哼了几种常用的曲调。其中一种，竟与马思聪著名的《思乡曲》开头四个乐句非常相似。音乐家懂得从民间吸取营养，才能这样简洁、流畅，正所谓“天成”。

有一天，看守派我们去擦玻璃，到了办公区。那是中间院落二楼的一个房间，我们边擦边聊。忽然她不再说话，眼睛发直，一动不动地盯着院门口。我随她转过脸去，见一位熟悉的看守，带着一个高个子男人慢慢走近。那人头戴一顶灰色乌克兰式圆皮帽，一副近视镜，两手揣在大衣兜里。走近时，不经意地向上扫了一眼，继续向前走。我悄声问：“你认识？”她不答，面色紧张，仿佛凝滞了。下边传来一声呵斥：“怎么搞的，没看见？”接着是那看守无力的辩解。

回牢房后，她告诉我，那就是她丈夫。原来他也在那里关着。看守不知我们在二楼擦玻璃，竟让他俩碰面了，犯了大错。我问他到底有什么历史问题，她苦笑着，讲了这段往事。年轻时在天津，俩人好上了。她不顾家人阻拦，“私奔”与他结婚，那时她不到二十岁。后来他花钱“捐”官，在警察局挂了个名，一天实事没干过。不久解放了。现在说他是“警察局长”、“历史反革命”，其实这档子事早已说清楚。她的话虽无法证实，想来有些道理。如果够上“历史反革命”的格，或有什么劣迹，“镇反”一关就难得过去。

她一家三口原来早已在监中“团聚”，只是互不知晓、不得见面，比邻若天涯。好在都活着，就算很幸运了！

因“内人党”案入狱的 38 号

大约三个月后，监室又来了新人。那个午后，一阵杂沓的声响停在门前。门开了一半，一个披头散发的人冲了进来，未及看清颜面，那人已扑到我的被上大哭起来。穿一件灰褐两色碎花线呢小棉袄，瘦削的肩一耸一耸。劝她也不理睬，半天才坐直，双手还在脸上抹来抹去。略微平静后，把脸转向窗外，呆呆的，谁

也不看。直到五官全部露出，我才发现，这人我认识。但我不能表现出认识她，她同样不能显出认识我。互相认识，必调开无疑。16号见她选择了我的床，果然起了疑心，悄声问：“认识？”我摇头。其实她选我的床是无意的。

她是内蒙古日报的。她曾在人大新闻系专修科读过。在校时，我们没说过话。到内蒙后，有过接触。她有两篇长通讯给我留下印象。一是写“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的，另一是文革前夕，写一学毛著积极分子、一位女牧民的（这女牧民名叫“绿女子”，很特别，一看就记住了）。估摸她有四十岁，中等偏高，细瘦。蒙古族，但她的长相不太典型。瘦长瓜子脸，肤色偏暗；鼻梁高、鼻头瘦削；眼睛圆而黑。过去，经常披一件黑色皮外套，很神气。

趁16号不注意，我赶紧走到她的视线内，做手势让她不可说穿。从她进来起，我们互称代号，16号、61号、38号，以示非亲非故。

据我所知，38号参加革命很早，曾在察哈尔、热河边区的报纸工作。在我印象里，她很革命，曾对我说过要重视思想改造，争取入党的话。没听说她本人有什么问题，可能是受她哥哥牵连。她哥哥是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年轻的老革命”，其工作能力、人品曾广受赞誉。现在被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成员，亲属岂能不受牵连？她的小弟在内蒙师院教数学，不久前被逼自杀。弟媳在电台图书室工作，亦成了反革命家属（和我有一段“牛棚”缘）。一双小儿女成了没爹的孩子。近来看到原内蒙军区保卫部副部长图们（与人合作）的书《康生与“内人党”冤案》，进一步得知：38号被抓入狱，当在1968年4月。其兄文革初虽被打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成员，后又被结合进革委会。而在大挖新“内人党”时，他再次被揪出，并被诬为党魁，株连到家族。书中说：自从他被揪后，亲属也大多未能幸免。妻子不堪严刑拷打和屈辱，跳楼致残；他的四弟是建国后培养出来的内蒙第一代能用蒙语讲授大学数学的教师，在挖“内人党”运动中被摧残致死；大妹是《内蒙古日报》记者，也被打入监狱；二弟、三弟遭受长期监禁，年迈的父亲和岳父母受到批斗；只有小妹因远在四川三线军工厂而幸免于难。（见该书第17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38号进来以后，我们监室生活又有了新内容。先是她讲外面的形势，滕海清的革委会有什么新举措。后就互相讲自己看过的书、背诗、唱歌。当然都是悄声又悄声，不让看守和小兵抓住。38号心情稍好时也爱说话，东部口音（内蒙

古的地形，像一个新月形的“飞去来器”。东部蒙族说汉话像东北话，西部蒙族说汉话则像山西话）。允许开窗时，她常以窗为镜，梳梳头，左照右照。有一次干警们一人一把大扫帚，说笑着扫院子。这情景、这气氛是我们多日未见的。38号看着窗外说：“人家‘人间’劳动呢。”话音未落，“啪”地窗子被合上，外面喝道：“不许看！”她本能地向后一闪，说：“咱们‘鬼间’不许看。”此后，我们就沿用这两个新词，说他们“人间”在干什么了，我们“鬼间”又怎样怎样了。

38号常常若有所思地用手抚平半旧的黑色毛料裤子。她双手的小指不知是否受过伤，伸不直，在三只又瘦又长的“哥哥”后面，很妩媚地弯成一个小弯儿。一下一下、不紧不慢地“熨”着；有时手上还沾些水，除去肉眼仅能看见的微尘。16号见她在意穿着，没事找事地说，裤子可以翻个儿，和新的一样。挑得38号动心了，细问如何翻法。16号说拆开以后，里子作面。前后片不能换，如果屁股磨花了，可以上下换。不够宽，用裤腰裤脚的贴边在裆上加一条。16号又现身说法，拆自己的裤子做试验。38号说，要有针线就好了。兴头上，她喊“报告”，要求看守通知家里送些针线、碎布来。

两天以后，果然从小方门里递给她一包东西。针线、顶针、各色布头码放整齐，还有她不曾要过的手绢、袜子。我们正要欢呼，38号忽然捂着脸哭起来。准是见了自家的东西，想起两个孩子。女儿上高中，儿子上初中。没学可上，闲在家里。后来又听她说，丈夫早在热河时就自杀了（好像是因生活上的一些误会）。她没再结婚，娘儿三个相依为命。这一坐牢，撇下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够揪心的。比起她和16号来，我算是省心的。父母还有姐姐姐夫照顾，幸运多了。

以后的几天里，她俩一心一意翻改裤子。放风时，竟穿着毛裤出去，惹得女看守的目光在她们身上扫来扫去。我平时一碰针就扎手，不敢多掺和。只见她们拆了缝、缝了拆，又弄湿了“熨”。果然新了一色。两人穿上来回走，很是得意。臭美完了，38号叹口气：“新又咋的，给谁看呀！”16号说：“自己看！到什么时候，也得整整齐齐的。”后来，38号被提审。出门之前，她特意把裤子捋平，夸张地摆了个抬头挺胸的姿势给我们看，然后迈步出门。

我们互相讲自己看过的书，背诗，讲故事。搜肠刮肚，凡能想到的都翻腾出来了。有一次，我忽然想起《胡马》（调笑令）：“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这首小词，可能

是太顺口，一读就记住了。我说：“你看多惨——迷了路，又‘边草无穷’，还‘日暮’！”38号抄起一张黄草纸（监中发的卫生纸），非让我写下来。然后坐在床上抱着腿，把草纸放在脚边专心地看。我和16号又说起别的话。忽听38号抽鼻子，哭得很伤心。“怎么了？好好的……”她哭着，断断续续地说：“我，就是那个，胡马。”

16号被提审后，几天会被叫出去一次，每次约两个小时。屋里只我和38号，她对我说了些我从未听过的事。她说，采访草原英雄小姐妹时，问她们为什么冒生命危险去找羊，她们说：公家的羊，死一只要赔一只。我们家穷，哪赔得起！38号强调：“是我听她俩亲口说的呀，跟后来宣传的不一样。”还说到那个“绿女子”。她说，人家本名叫“绿太阳”。毛主席是“红太阳”，她叫“绿太阳”。不改，哪敢见报呀！说这些话时，很无奈地摇晃着头，从牙缝里吸着冷气——蒙族人遇到不可思议的事、惶恐而毫无办法时，常常做出这副表情。

关于“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我认为，即使是怕赔不起而冒暴风雪找羊，也很了不起，也是英雄。她们那时一个十三岁、一个九岁，妹妹还因此冻坏了脚，落下残疾，多么坚强的孩子！近年来，她们接受媒体采访时，都很诚实。说父亲是出去给别人帮工挣钱，才不得已让她俩去放羊（原来的“宣传”，说她们的父亲是为公社的病羊出诊）。玉荣受伤以后，父母觉得有愧，不该叫这么小的孩子出去。对比宣传上的作假，她们的实话要可信、可爱得多。

看守们

我们在监中，眼睛的用途有限；用耳朵的时候更多。外界的各种活动：放风、吃饭、提审、哨兵轻轻的走动，全用耳朵吸纳、辨别。无论在做什么，耳朵都不能放松工作。我们能从脚步声，听出是哪个看守来了。轻快的皮鞋声，是年轻的小个子当地人，每早负责倒洗脸水的“眼镜”。脚跟提不起来、一步一拖的，是“中个儿”。爱穿布鞋或胶鞋，中等身材，脸色黑黄，说一口慢悠悠、拖沓的巴盟河套话。两个女看守，一高一低。高个儿，脚步轻而稳，像运动员。脸黑，我们叫她“黑子”。矮些的，像初中生。脸嫩嫩的，戴眼镜。穿半高跟皮鞋，哆哆嗦，小碎步。对她没有固定的称呼，有时叫“小个儿”，有时用手比划“眼镜”再说“女的”。她特别爱训人。

至于哨兵（狱警），与看守不是一个系统。刚进来时，看见小门缝里有刺刀闪过，总想起唱过的一首俄罗斯革命歌曲：“太阳出来又落山哪，监狱永远是黑暗。守望的狱卒不分昼和夜，站在我的窗前。高兴监视你就监视，我绝逃不出牢监。虽然我生来喜欢自由，砸不断千斤锁链。”而我们现在是“反革命”，坐的是共产党的牢。牢。

所幸我们没有锁链。每晚熄灯前后，都有一个重犯，拖着脚镣，一步一哗啦地出去。半夜或更晚些，这人被送回。根据声音判断，他的监室距我们有四或五个门。每听到这“哗啦”声，我们都静下来，仿佛一步一步陪着他走。若是“中个儿”带着，听不到呵斥。西侧隔壁也有一个戴脚镣者，每次出门，都伴着“咕咚”——重物落地的声音。莫非他是个伤残人，迈不了门槛？他常挨骂。

16号和38号彼此熟悉后，监室里气氛较松弛，互不戒备。38号在窗台下的白墙上用石子画道，记录在“鬼间”的日子。五一节早晨放风时，采了两丛野花，捏在手心里偷偷带进来，插在喝水缸子里。还轻声唱了国际歌。一天早饭后，三四个人突然开门进来，凶神恶煞的。“黑子”打头，后面的不认识。我正在想出了什么事，一人大声喝道：“起来！冲墙站着！手背后！”只听他们在床上、褥子下面翻了一阵。坏了！有张纸在褥子底下，是听38号讲外面形势时写的。可能还有考虑问题的提纲，这下麻烦了。她俩可能也有东西被抄走。这伙人又重申纪律：不准互相谈案情，有问题老实交代。只剩我们自己时，半天没人说话，好久才缓过劲来。真没想到在牢里还会被抄，前段有些麻痹了。又一想，反正人都进来了，还能怎么样？随它去！

她俩都在奉命写交代材料。那天抄走后，不久又从小门里递进来，一句话没有。她俩查看一番，确定没被截留。我这里心还悬着。两天以后，我被叫出去。训我的是第一天遇到的目光尖锐的瘦脸人。“知道你为什么进来吗？”我想过有很多原因，真还没有总结出一两句简单的话，来准确地回答。我说，我思想认识和革命群众有差距；我说，我有些坏毛病，爱随手乱写乱画……他听着，并不言语。不像批斗会那样立刻驳斥我。当然，不说不等于认同。我说完，他问：“以后应该怎么着？”我说吸取教训，努力学习，改造思想。听到这里，他突然大声质问：“你吸取教训了吗？”手掌重重地拍着桌上，那儿有一张纸——是那张被抄走的、十分熟悉的小纸。上面除了字迹，还有一些小人头、花花草草，无意中

乱画的。“为什么还要乱写乱画？”从被抄那一刻，我就在反省，恨自己不长记性，伤疤没好就忘了疼。此时，我无话可说，我的确没有吸取教训，真是不可救药！他把那张纸给我，叫我回去好好反省。回到监室，说给她们听。那瘦脸人虽凶，却把问题定性在“乱写乱画”上，与电台造反派显然不同。他说过自己的名字，16号知道，说那瘦脸人是呼三司一号“勤务员”的哥哥。（1967年11月内蒙革委会成立，一号“勤务员”已当上常委。）

买必需的生活用品，写条子交给看守。我买过毛巾、梳子、清凉油等。“黑子”拿来给我们，一看，都傻了。不知从哪儿买的，“怯”得没法看。塑料梳子是大红的、半月形；农村老太太使的那种。毛巾是藕荷色的小方巾，四块全一个色。我用黑线“绣”上一个圆圈儿、一个月牙，将手巾、脚巾分开。清凉油数我的那盒好闻，薄荷味里多一丝玫瑰香，她们都喜欢。约定好如果我先出去，这盒清凉油得给她们留下。

头发长了，向“眼镜”借剪子。他不借，说“长了梳辫儿”。我说你放心，我们不会自杀。他瞪了我好一阵：“怎么说话呢！”第二天递一把推子来，我倒犯了难。举着看了半天——既然它是由小剪刀组成，那就能用。我凭感觉掌握高度，用一排小剪刀反复切割，终于将头发弄短。虽然不齐，也是短了。后来改为理发员进监室，估计借我们推子用也是违规的。

夏天，一个上午，“黑子”叫我们洗被——犯人的脏被。在一个封闭的小院里，用具一应俱全。中午“黑子”特意打招呼，不够吃可以拿几个窝头来；还破天荒地放了一壶开水。洗好晾干后，16号过分积极地要求将变黑变硬的棉絮重新续过，“黑子”不反对。撕开棉花时非常呛人，落下很多粉状物，我从此咳嗽，并引发一场病（当时不知道）。干活那几天，“眼镜”借机凑过来说一些家常话。他说小时候穿鞋太费，一双布鞋几天就踢得张嘴了。老妈一针一线，多不容易！没有钱买鞋穿。工作了才见着个胶鞋、皮鞋。现在，老妈还是要做布鞋捎来……我不知道他这些感伤的话干嘛要说给我们听。一次“中个儿”路过，站在一边似看非看，不急着走。16号借机和他攀谈。“听说外边红卫兵打人可凶了，你们怎么看？”“中个儿”面无表情，也不看着我们，答说：“他们那么个做，我们不能说啥。要让我们那么个，我们不。”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像个西部农民。不会说官话、不会训人。脸上显不出喜怒哀乐，又时刻保持距离。我们都觉得“中

个儿”是厚道人，可信赖。

小女看守动不动把人叫出去，没头没脑训一顿。她最常训我的是：“你了不起，你是大学生！看把你骄傲的！不好好改造想出去？永远出不去！”有时我发现她训人的话一套一套，并不完全针对我，悟出她是在拿我练习。于是就老实站着，不必对她的话做出反应。忍到一定时候，她练完了，喊一声：“回去！”便自顾自地走了。由站岗的小兵关我进监室。她声音刺耳，又离得近，震得耳朵生疼。

看守各有品性，我们也各有好恶。但说一句公道话，我们几个没挨过打，没受过体罚。那时公检法没有大乱，还在按规矩办事。

被控“反对毛主席”罪的“45号”

早饭稠粥咸菜，下午窝头烩菜，固定不变的牢饭，开头真吃不下；一如老资格犯人所说，到后来竟不够吃了。菜中偶尔多放一点五香面，都觉得其香无比。38号会把碗底褐色、混浊的菜汤，无论碜牙与否，全都喝光。后来发展到跟送饭的炊事员老头多要一点菜汤。老头从不驳面子，不无怜悯地说：“欢欢儿（快快）交代吧，宰（这）不是个好住处。”

38号进来一个多月后，又来了一位——45号。高高个子，白里透红、粉嫩嫩的长方脸，整齐的短发梳至耳后，一身淡灰色制服，白帆布鞋。其鲜亮和我们的灰暗恰成对比。偏她一进门便很能认同，红着眼圈与我们一一握手。那天我们仨恰恰站成一排，她又握得缓慢而隆重，像硝烟未尽、部队首长接见作战有功人员。

45号自我介绍说，丈夫是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自己因“反对毛主席”被抓。用报纸抄大字报时没注意，背面有毛主席像。“往主席脸上抹黑”，一等大罪。她得知全天的饮用水是随早饭一次性发放，就向家里要了个头号搪瓷缸子，大得能把脸装进去。我这才长见识，原来缸子的大小是以“号”分的。平时用的漱口缸，也就六号或七号。38号和45号都有在伪满上学的经历，彼此能说一些旧事：冬天冷得邪乎，日本老师拿棍子抽人，“高丽棒子”狗仗人势等等。混熟以后，45号最爱说做菜、做面点，招得大家肚子咕咕叫。16号说，赶明儿个出去，焖一大锅米饭、炖一大锅肉。38号说，啥也顶不上手扒羊肉。煮的时间长了不行，顶多半个小时，又嫩又香。我没那么高要求，只想吃个大馒头。45号

说，将来请我们到她家做客，她做奶油点心招待。38号悄悄对我说，45号充其量就是个称职的官太太、家庭主妇，当“反革命”抓来，实在是冤。

天渐渐热了，衣服需要缝补改造，45号带头掀起做活热。16号、38号都有基础，我最差。我说，我跟你们学做活吧，反正有的是工夫。38号的布头、针线又派上用场。先是补衣袜，后又用碎布拼干粮袋（下午的两个窝头，省一个，留到第二天中午吃）。我缝得尽可能整齐、针脚密，还是被45号一下子甩了回来。

“这叫什么？粗针大线的！重来！”我说这比以前不知好多少倍了。45号假装生气，板着脸说：“你不是要学活吗？要不就别学！”我只好拆了重做。她真厉害，连挑几根布丝儿都有数。细线用完了，38号贡献出她的丝袜子，我们一点点拆。两股合一股，细得几乎看不见，

全凭手上的感觉。我用这种细丝线，把一件肘部磨破的长袖衬衣改为短袖，打补丁还要对上图案，不细看真看不出是补过的，总算被老师判了及格。

（上图：作者在狱中改制的衬衫）

38号缝东西，握针时手心向上，把针放平。从远往近缝，像写竖行字。说蒙古人都这样做活儿，让我们大开眼界。剪布，没剪子；我们就趁放风，偷偷拣块玻璃碴子。回来背对着门，两人抻着，一人割，很快就割开了。后来我们能用玻璃碴熟练地割出各种形状的布。

我一直保存着干粮袋和改造成的短袖衬衫。这是那一段生活的见证物。我的针线活绝差，只有那时达到最高水平。以后再怎么努力也做不到了，怪不怪？

检查交代与提审

进来一个多月时，因等不及提审，想尽快把自己的事说清楚，在狱方的同意下，我写了一份交代材料。就造反派编派我的罪行做检查或说明。

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也不认为自己思想认识上有多严重的问题。但在一浪高似一浪的“左”潮中，很难依然故我。我尽量上纲，从出身、经历、受修正主义思潮影响等几个方面检查自己，否则过不了关。检查内容概括如下：

一、“对领袖人物也要一分为二”问题。如前所述，是由评论毛主席的字引起的。1964年“小整风”被上纲为“感情问题”，我不同意，认为是“学术问题”，整风后期未做结论。当时我很不服气，在日记上大大辩解了一番。

这次在狱中写检查，是在神化领袖人物的高潮中，我无法再用日记的调子说话。虽然我对刻“忠”字、“早请示、晚汇报”、“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等形式主义仍很反感；对“最最最”，觉得是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对“抬头望见北斗星，低头想念毛泽东”、“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觉得虚假造作；但必须承认自己与革命“左派”有差距，自己远远跟不上趟。承认“感情”确有问题。不得不按时髦的说法：“个人崇拜有两种”，检查自己不懂政治，受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毒害。

而“一分为二”，我回避了。日记中幸好没有具体分析。自己也不知怎样去恰当“分析”。“一分为二”是毛哲学的标杆，说是无事不能、无处不在的。可几乎人人明白，某些人某些事就是例外，就是碰不得，就是不能分析。我也只能学学乖止步于此，老实承认自己无知。

二、对报纸上批判鬼戏，原是有看法的。这时不能再坚持。只能按当时的说法，检查自己不懂得“以死人压活人”的“政治用心”。

三、对“修正主义文艺”、名著，检查自己只从艺术角度欣赏，不明其政治本质。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受了毒害。

四、对电台文革现状的看法，是以“左”的观点很表面地分析了几位当权派，其中不免夹杂个人好恶。

对造反派掌权后，借“支左”排斥异己；借“工作需要”将自己的家属从基层调来；违反《婚姻法》，干预C和D的婚事；C跳楼身亡后，怕担责任又编瞎话，抓人封口等，坚持了原来看法，丝毫未因自己处境凶险而改变。

五、笔记本封皮上列宁头像及“有罪必杀”字样，说明不是同时画、写的。

大约第四个月，终于盼到了提审。预审员是一位三十出头的人，穿黑色对襟棉袄（未着制服），表情严肃，远远坐在两屉桌后。我被安置在屋子中央，一个不能任意挪动的木墩上。看守站在门外。没有书记员，预审员边问边记。

头两次提审，集中在“对领袖人物要一分为二”上。详细问经过及认识，提问很直截。如：“你认为不是感情问题吗？”“以前认为不是，为什么？”“现在的认识对吗？”有时又咄咄逼人：“你究竟要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怎样一分为二？”

我回答时他记录，一般不驳斥、不打断。有一次我说：“当时的想法，日记里有，你们可以查。”他厉声喝道：“该查的我会去查，现在是问你！”由此，我猜想造反派没有把日记本交给狱方。

(右图：作者被搜缴作为“反革命”罪证的日记本)

列宁头像是他提审的第二个重点。他的话很激火：“你对列宁有什么仇恨？为什么要写‘有罪必杀’？”我说：“没有仇恨，不可能有。记得画列宁以后，写了一句俄文（高一课文里的）。意思是‘列宁和斯大林给了我们新的生活。’”（可能还有“学习，学习，再学习”，时间太久，忘了。）“‘有罪必杀’是和别人开玩笑写的。”“和谁开玩笑？”“可能是和录音组长××。”“谁能证明？”“这我很难说。开会，大家都坐在会议室，肯定有人看见。现在谁能证明，我确实不知道。”“你怎么能证明列宁头像和那四个字不是一次写的？”“我觉得公安部门应该有办法对笔迹做化学分析，哪个在先，哪个在后。”他可能没想到我这样回答，愣了一会儿，低头记录，没有再发问。

对电台走资派、造反派以及 C 的事，他似乎不感兴趣，基本没问。我说到时，他也似听非听。每次提审完，都将记录给我看。提问记为“？”；回答记为“：“；他训我的话，省略很多，只写“（教育）”。如无异议，签字。

他提审的重点在政治问题，因我是“现行”的“政治犯”。他用“激火”的办法，是逼我说真话。他虽严厉，也训人，但目的是弄清问题。和造反派的无限上纲、不听解释、不让说完的恶劣作风完全不同。记得共提审四次。最后一次，上来先问：“身体怎么样？”面色温和，使我感动。那是七月份，估计那时他们对我已有结论。

2002 年 11 月 25 日，定居天津的原录音组长来电话谈到此事。她说 1968 年夏天曾被叫到看守所两三次，不仅为我一人的问题。一个面目严肃的人拿出那张牛皮纸本子皮，问她见过没有，上边画的戴尖帽的“小丑”是谁。是不是江青？她肯定地说，戴尖帽的，画的是她本人。“因为我刚当录音组长，她看不起我，恶心我呗！我俩爱开玩笑，起哄瞎逗呗！”看来，那位预审员是在找旁证。她的



回答和我“交代”的一样，总算可以证明了。1979年发还这些“罪证”后，我又仔细看过。戴尖帽的小丑旁边就写有“录音组长”四字，字迹清晰不难辨认。为什么要往江青那儿扯呢？

看病

在狱中，随着时间渐长，体质逐渐下降。我们学华子良在监室里做操，后来也懒得做了。竟然放风回来都觉得气短、腿软。不过五六十米，来回一百多米，去时提个小桶，回来桶也空了。探讨原因，还是伙食差。每顿吃得不算少，但总有饥饿感。我们谈笑说，越狱其实不容易。要比看守跑得快，比站岗的小兵们跑得快，简直是不可能的。

从洗被、缝被以后，我更觉体力不支。全身软塌塌，没有一点力气，躺下就不想起来。午后关节酸疼，脸上、手心发热，夜里出冷汗。凭经验，认定自己在发低烧。估计又到了风湿活动期（从1964年四清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以后每逢春天都要发作）。后来就咳嗽，痰多。向看守要了个大口瓶，垫上纸，作痰盂。

有天早饭后不久，看守说：“准备一下，带你看病去。”6月份，已经热了。我穿上那件改制的短袖衫，外面套上棉袄罩衣；将棉罩裤当单裤；脚下是冬天穿来的高腰翻毛皮鞋。院里停一辆中型吉普，里面坐了几个男人。从衣着、神态看，他们和我一样是犯人。最后上来的一个年轻人极瘦弱，是被人架着连滚带爬上的车，“中个儿”让他在座椅之间半蹲半坐。我想起，曾听过一个进出门槛“咕咚”一声的，想必就是他了。他脚腕又细又脏，脸色苍白，神情安静或说有些呆滞。在监中戴脚镣说明是重犯，他只能爬着走，还怕他逃吗？也许他原本是正常的，也许戴脚镣是一种“待遇”，与逃不逃跑无关？我瞎想着，车开了。“中个儿”在车门处巡视着，而这些人或看窗外，或无聊地盯着自己的脚，无心做犯规的事。

走了40分钟的样子，说“到了”。我一看，太熟悉了，是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那时公费医疗很宽松，只要带着小本子，到哪家医院都可以。这医院设备不如内蒙古医院，但医术不错，离电台也近。图方便我去过几次。这次不同了。从一下车，就引人注意，人越来越多，形成围观。人们嘁嘁喳喳议论着。我的样子一定很特别，穿一身不合时令的衣服，后面还有公安人员跟着。候诊时更糟了，我坐一张椅子，两米以外就是围观的人。“中个儿”不客气地轰着：“走开走开！”

有啥好看的！”人们挪动一下，很快又围拢来。我希望他们看着没意思自动走开，没想到他们像买了票看戏，不看出什么新鲜玩意儿，舍不得离开。我有什么值得这样看呢？我心里好笑，索性坐稳了，抬头与他们对视。就在对视的一刹那，有人后退，有人把目光移开。我此刻很平和，觉得自己没做亏心事，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和他们没什么两样。愿意看就看吧。

“61号。”护士看着挂号单子，迟迟疑疑地喊着。她奇怪这人没有姓名。我站起来，围观者闪出一条路，又挤在后面尾随着。我从透视室出来，医生正和“中个儿”说话，把处方交给他。我在夹道“护送”下走向吉普车。

回到监室，向她们描述了看病经历。38号说，不定哪天，把咱们拉出去游街示众，咱们一个拉一个别摔倒，咱们挺胸抬头（做了一个姿势），不能显倒霉相，不能让他们看笑话。我和16号都很赞同。这一天我对自尊有新的感受。我们被批斗、受歧视，无法争辩，只能忍受。但千万要保持理智，要学会受人所不能受，要在内心为自己撑一根钢筋，冤不死、斗不倒、压不烂。这也是一种自尊。

“中个儿”从小窗里把药递进来。我问什么病，他说肺结核。着实让我吃了一惊。38号说，就是叫脏棉被闹的。16号是久病成医那一类，告诉我：“有药治，没事儿。”我知道结核病是“富贵病”，在这里恐怕难以痊愈。但不知哪来一股劲，硬是相信自己能顶得住。

狱方也许不懂这种病，也许有困难。他们只给我一周的药，又去内部的“新生医院”开过一周的药，就不再给了。结果可想而知。

出狱

有一次从窗口向外望时，发现前排房子西边山墙下，距我们约二十米，站着一位高个子军人，正朝我们这边看着。四十多岁，脸色温和，或多少有些笑意。我叫她们三个过来看，一致判定是个新来的。军装和警服的差别很明显，他不是公安人员。他又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一天早饭后，提我出去。瘦脸人一身蓝制服，端坐在桌前。为什么不是预审员而是他呢？他自报家门后，问：“你身体怎么样？”——此问出乎意料，我答还可以。又问对自己的问题怎么认识，我按预审时的口径简单作了回答。再问对狱中工作人员有什么意见。呆了这么久，头一次听到这种话，确有些感动。我说

没意见，感谢各位对我的照顾。最后问：“你有什么要求？”“我想了解电台运动进展情况。”说完又觉得这不是他所能回答的。而他回答得既快又轻松：“这你很快就会知道。”说着，门开了。进来一个很久未见的人——电台保卫科原科长。脸上木然无表情，在我的右后方坐下。他原是“老保”，不是造反派。这说明形势有变。瘦脸人说：“电台来人接你，你一会儿就跟他回去。好好治病，继续改造思想，积极参加运动。”我不知不觉中涌出泪水，因为他的语气已不是对待“反革命”，因为我终于挺过来，等到了这一天。

他说完立刻站起来，示意“黑子”先行，三人快步向监室走去。一切都发生得这样突然，真有些转不过弯来。门打开后，她们三个，16号、38号、45号，愣愣地看着，似有些明白。瘦脸人发话：“把铺盖卷起来，东西拿好！”她们一齐上手，边收拾，边跟我作无言的交流——我们曾互相托付，先出去的，要为里面的难友奔走。记住找什么人，办哪些事等。最后我把她们喜欢的那盒清凉油留下，轻轻说，你们用吧，保重。短短几分钟，在四只眼睛的监视下，我们完成了嘱托和告别。

瘦脸人负责将原来收走的东西还我，嘱我十天之内来补交饭费。又强调纪律：这里的情况，不许对任何人说。我想到，被关了好几个月，应向他要个手续。我问：“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证明’，类似‘判决书’？……”他说：“你是‘群众扭送’，在这里是‘拘留’。拘留期满，退回原单位。要什么‘证明’？”

这一天是1968年9月16日。我被关押七个半月后放出。没有给我一个定性的说法。

坐着电台的吉普，我、科长和司机一路无话，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回到电台。下车的一刻，我在心里郑重地说：“我回来了！”

【蓦然回首】

按：沙漠，本名张坤权，女，40年代在陪都重庆即有影响的著名话剧演员，50年代中期与丈夫黄中敬一起作为业务骨干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支援青岛市话剧团。1957年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中再遭批斗折磨。八十岁前后开始用电脑写作回忆文章。读此文可参看作者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发表

的《给毛主席打电报的故事》。

孩子，你还记得吗？

沙 漠

人的一生总会有不少难以忘怀的事。

一个姑娘，几十年来我铭记难忘。有时深埋心底，却又时时浮上心头。

那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长得俊秀美丽，特别是一双动人的眼睛，水灵灵的，透着清纯、善良。她一身戎装，臂上戴着红袖章。这是一个充满朝气，叫人见了生爱的姑娘。我其实不认识她。但我一直忘不了她。忘不了她，不仅因为她美丽和那一双充满善良的、动人的大眼睛。更因为她打过我——用皮带抽打过我，用皮靴踩踏过我。但，无论当时或是后来，我都没有记恨过她。我懂、我原谅。她是无辜的。她还那么小。

那是疯狂的年代，是领袖号召“要武”的年代。许多年轻人响应号召，学会了打人。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我当时由于不肯挂“牛鬼蛇神”的黑牌，被北京来的一个红卫兵猛掴一耳光，顿时，原本有病的牙，全部松动了。他没能制服我，便狠声道：“猖狂！明天有你受的！”于是，第二天便聚集了一大批来青岛串连的首都红卫兵小将，演出一场声势浩大的武斗。揪斗场面颇壮观，满院子红红绿绿的大字报从二楼窗口直垂下来，全是书赠我个人的，参与的、围观的人群把大院挤得满满的，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儿。陪斗的牛鬼蛇神有十多位。我是唯一的主角，挑大梁。口号声响彻云霄：“打倒张坤权！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问：“为什么不挂牛鬼蛇神黑牌？黑牌呢？”

答：“黑牌让我撕毁了。我没罪！”

“打！”一声令下，拳脚交加，还有皮带、锥子。我没有倒下，咬着牙、挺着。我有护身符——贴身放着小小的红宝书。我凛然，状甚英雄。

(右图：作者文革后期留影)



忽然，刺耳的一声：“李××你不是没打过人吗？快过来，过过瘾！打！别怕。”有人回应“哎！不怕。打。”奶声奶气。我一抬头，眼前举着皮带的竟是一位未脱稚气的美丽的小姑娘，她竟有几分像我的女儿。四目相对，那眼神里流露的全是善良。我脱口而出：“孩子，别打！”声音微弱，周围大约没人听到。但她，那姑娘分明听到了。她会不会想到自己的母亲？瞬间，皮带停在了半空，迟迟没落下来。“打呀！打牛鬼蛇神！”一旁有人在鼓劲。“哎，打！”声音很小，皮带落下来了，出手很轻。不很疼，但，似打到了我心上。我心一颤。“用皮带的铜头，用铜头这边猛抽，要这样！”有人在教着，在示范。“哎，用……用铜头抽，我……我不怕……”奶声奶气，声音在发抖。我想看看那双眼。却不料她竟闭着眼抽了下来。我疼，心疼，心在滴血了。我用尽了力气大喊：“红卫兵小将要听毛主席话，要文斗，不要武斗！要珍惜啊！你们是伟大统帅亲自检阅指挥的首都红卫兵！”

我不停地喊，拼命地喊，小将们不停地打，拼命地打。终于，我被打倒了。一人领呼：“踏上一只脚！”众小将：“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慢了一拍的一声：“踏上一只脚……”我听出来了，是她！我挣扎着抬起头，四目又相遇。依然美丽、动人，却多了惶惑，迷茫，还有惊恐。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我大叫一声“啊！”昏死过去。那不是皮肉的痛楚，那是心被打破了，被踩碎了。天缺一角，有女娲！心破了，碎了。谁能补？！

这往事过去已三十多年。我仍然时时会想起。而每当我思及四目相遇的瞬间，我仍心悸、心疼，我依然难忘那双动人的大眼睛。我多么想再见到！一天，我真的又见到了她，她已变成中年模样，穿得很入时，很有风度。没变的是那双动人的眼睛。她身旁依偎着一小姑娘，亲热地叫着妈妈。这姑娘酷似当年的她，母女漫步在海边，沐浴在秋阳中，脸上荡漾着幸福。我注视着她，她没觉察，没认出我（她怎会认识我呢？），正擦肩而过，我猛地转身，张开双臂去拥抱她……

门铃响了，午睡中的我被惊醒了。哦！是梦！这真是白日做梦。我多希望这梦能延续下去，我要抱抱她，我会问：“孩子，你还记得吗？”我会告诉她：“那是一场噩梦，你我同是受苦人。”我还会说：“年轻人做错事是可以原谅的，何况你还那么小。只是我们都不要忘！不要忘！不能忘！在你的孩子懂事之后，你要对她说说这故事，对她说那是民族的大浩劫！灭绝人性！那叫‘文化大革命’！要她也记住。为的是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为的是子孙后代的幸福！祖国的昌盛！”

孩子，我真的很想你。我不恨你。

我们应该庆幸那场噩梦终于成为过去！疯狂的年代已成为过去，而需要我们思考的是：这账究竟应怎么记？

【忆旧思亲】

追忆父亲徐韬

徐伟杰



五十年代初，父亲调北京中央电影局工作。我亦随之赴京就读于北京三中。家中不举炊，每天放学后便到位于羊市大街的电影局吃晚饭。饭后，我就趁人不备偷偷溜进后院的放映间，这里经常放映外国影片，这使我乐而忘返，常常荒疏了功课。也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江青。

江青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作曲家舒模叔叔的太太就叫江青，他们是父亲在演剧队的老朋友。一次，父亲又带我去舒家玩，一进门我就高声喊道：“江青阿姨，江青阿姨！”江青阿姨满面春风地迎了出来，谁知父亲却沉下脸来对我说：“以后不许再叫江青阿姨！”“为什么？”“大人的事，小孩不许多问！”回家以后，父亲才告诉我毛主席的夫人也叫江青，普通人必须避讳。

从此，我渐渐地知道了另一个江青。然而，正是这个名字像鬼魅一样缠着我的父亲，久久挥之不去，直至掠走父亲的生命。

电影局的院子里有时会驶入一辆轿车，这是一辆漂亮的捷克造甲壳虫轿车。五十年代的北京，西四和西单的牌楼还没拆，满大街跑的都是骡马大车，汽车很少，这辆甲壳虫轿车属时髦之物，十分抢眼。这辆车便是江青的座驾。只要它出现在电影局的院子里，闲杂人等，一律回避，更别说我们这些小屁孩了。而父亲也会满脸严肃地把我赶回家去。

江青时任局里电影处处长，而满局上下没人敢直呼她为“江处长”的。江青平时从不来局里上班，但是审查影片或有好看的外国参考片，她从不缺席。审片时，她总是悄悄地坐在后边，一言不发，可是，现场的气氛却一下子变得诡异起

来，一向健谈的王阑西噤若寒蝉，大嗓门汪洋忽然木讷起来，妙语如珠的吕班也装起了正经……大家不约而同地压低了嗓门，小心地选择着中性的词汇，慎重地表达意见。末了，父亲照例要恭敬地请示：“请江青同志发表意见。”这时，大家支起耳朵，目光齐刷刷地转向江青。每当此时，江青总是俯身用铅笔在本子上写着什么，并不抬头，只是轻启莲口，慢悠悠地吐出三个字：“没意见。”

不要以为，江青只是挂了个闲职，或许是后宫生活枯寂无聊，弄几部电影解解闷儿，让“心灵坐沙发椅，眼睛吃冰淇淋。”她平日貌似谦恭，从不轻易表达意见，可是我父亲明白，只要这个女人忽然对某部影片表示兴趣，那就意味着一场大灾难即将降临。此前，影片《武训传》、《清宫秘史》、《我们夫妇之间》被她调进中南海，没多久，全国各报刊杂志上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继而迅速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又快速升级为人身迫害……其来势之猛，出手之快，手段之毒辣，令人不寒而栗。父亲说，江青的记忆力极强，看片非常认真，时隔多日，影片中的语言、镜头、细节仍可描述得毫爽不差。江青就像一个蛰伏在黑暗中的猎手，她有足够的耐心和计谋，一旦猎物出现，她绝不会手软，看到猎物被击中后肢体碎裂临终前绝望的挣扎，会使她获得前所未有的快感。有鉴于此，大凡来京送审影片的导演，听到江青“没意见”这三字经后，总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连夜来找父亲打探消息。父亲总是尽量安抚他们，替他们出谋划策，如何经过改动可以顺利通过，让他们焦灼恐惧的心情慢慢地平复下来。常常谈到月影移窗，白露湿阶。其实，父亲也只是揣摩江青的意思，与局长王阑西商议后决定影片的审查意见的。父亲所以能够揣摩江青的想法，是因为他对这个女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当年江青以蓝苹的艺名到上海滩厮混的时候，凭着《大雷雨》、《娜拉》两部舞台剧一炮走红，准确说是凭着女人的特别手段，诱使唐纳和章泯把她这个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演戏的神经质的三流演员捧上了明星的宝座，那时候，父亲担任这两部戏的剧务主任，深谙这个女人心狠手辣，喜怒无常，不是省油的灯。

实际上司徒慧敏和吕班这些人对江青的老底也都是心知肚明的，只不过怕引火烧身，见面时大家都三缄其口罢了。由于父亲处处小心，进退有度，总算没有触到江青的逆鳞。相反，江青似乎对父亲怀有好感，见面时必以“阿韬”呼之，以示亲昵。父亲往往趁她高兴，不失时机地把对影片的处理意见请她过目签字，就这样不少送审影片得以绕过暗礁，平安到达彼岸。

江处长在中央电影局里“垂帘听政”的这些日子，父亲的心情可以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但事情也有例外，有几次，父亲竟然得到了江青赠送的照片，这是他绝对不敢奢望的事情，不免有点受宠若惊。这些照片都是江青自己拍摄的生活照，有她自己的，有她和女儿李讷的，也有她和毛主席的，背景好像都是中南海。照片的背面都有江青的亲笔签字落款，有的写“阿韬留念”，有的写“给阿韬”，用的是绿色的墨水。江青的字很漂亮，字体修长，秀气中带有须眉气，父亲说这是怀素体，她在刻意模仿主席的书法意境，应该说模仿得确有几分毛体韵味。父亲把这些照片收藏在一本相册里，不肯轻易示人。江青赏赐“御照”的事情，令父亲很意外，但也感到惶惑，是念旧吗？不像。上海的这段往事是她最不愿意被人提及的，避之唯恐不及，这是双方都心照不宣的事情；是一种政治笼络？此时的江青羽毛渐丰，急于搜罗一批文坛流氓在一场场文化杀戮中为领袖充当打手，但她绝对不会看上父亲这样的人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证实了这一点。不久以后，王阑西被摘掉了乌纱帽，司徒慧敏留任副局长，父亲立即被解职，回到了上海。江青无疑早就对父亲有了戒心。

对于官场，父亲倒并无恋栈之意，在江青面前，不得不时时戴上一副假面具，过着双重人格的扭曲生活，这早已使他感到了厌倦。无尽无休的会议，永远看不完的文件，虚情假意的应酬，言不由衷的姿态，这一切，使他痛苦而又麻痹，重新泊入艺术的港湾，才能够让他拾回心中的宁静和安恬。是的，自从拍完了《大地重光》、《草原上的人们》以后，他已经和摄影棚阔别得太久了。当他重新站在水银灯下，拿起导演的话筒的时候，他仿佛又找回了自己。回到上影后，他拍摄了《搜书院》、《海魂》、《小康人家》、《摩雅傣》等影片。然而，在当时的环境里，真的有可供艺术家容身的象牙之塔吗？“反右”、“大跃进”等汹涌恶浪席卷而过后，艺术家们惊魂甫定，柯庆施又厉声责难他们“严重背离生活，脱离工农兵”，提出“大写十三年”，实际上是把除解放后工农兵以外的题材全部封杀。父亲稍显放松的心情立刻又沉重起来。一天晚上，我听到了他和赵光沛（父亲的续弦）的一段对话：

赵：“阿韬，听说江青又到上海来了，你怎么不去看看她？”

父：“我看她干什么？江青每次到上海来，只见阿黄（黄晨，郑君里夫人）和君里，从来不找我和阿丹，她不愿见我，我又何必自讨没趣。”

赵：“你们在北京的时候不是合作得挺好吗？还送你那么多照片，你主动上门，她还能避而不见？”

父：“你懂什么，现在是敏感时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倒宁可她别老惦记着我。”

父亲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事实说明，江青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他们这批“老朋友”。

这一时期，父亲和赵丹每个礼拜都要到艾明之家中去打牌，其实，此刻他们的心情并不轻松。赵丹因为提出要拍《三国演义》和《红楼梦》遭到上海市委的当头棒喝，说他迷恋“古人、死人”，后来白桦写了《李白和杜甫》，赵丹对李白一角痴迷得发狂，终因李白也属“古人、死人”之故而不敢染指。牌桌上一方面可以排遣郁闷的情绪，同时也找寻着出路。一个想法渐渐形成了，这就是电影《青山恋》的雏型。《青山恋》是上海知青在林区成长的故事，不久以后在福建顺利拍成了。

上海电影局初审充分肯定了这部影片。父亲和赵丹难掩心中的喜悦，父亲说：“这下总算可以向市委交卷了。”赵丹说：“阿韬，这个戏我总算可以挂免斗牌了吧！”父亲一面为赵丹斟酒，笑道：“岂止是免斗，我看还要奖励一番呢，尤其是你演的老场长，演绝了，应该发给你一枚记功牌！”

《青山恋》送中央电影局审查后，立即被江青调入中南海。没多久，父亲带着江青的意见回到上海，马上向赵丹做了传达，大意是：《青山恋》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歪曲丑化林业工人和知识青年，赵丹演的老场长是武训的翻版。赵丹听后如同兜头浇下一盆冰水，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喃喃地说：“阿韬，这下完了……为什么，为什么她老是揪着我的武训不放，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怎么会有这样？”父亲说：“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快准备好一份检查，局里传达完了我们要当众检讨的。”“我心里乱得很，你是导演，还是由你代表吧。”“我当然要写。可是江青点了你老人家的大名，你能一声不吭？”“嗨……”“这一关总是躲不过的，江青不是说武训吗，咱们就顺着竿往上爬，说世界观没改造好，中武训的毒太深，不自觉的犯了错误。说什么也不能承认对当初批判武训有抗拒，借武训的阴魂向革命文艺路线反扑，现在有人正想把我们往这上面挂呢……”

灯光昏暗，晚来风急，两个挚友就像当初创作剧本一样，凑在一起，絮絮私

语，不过这一次他们在稿纸上洒下的是痛彻心肺的泪水。

1960 年，我高中毕业了，学校保送我进军事学院，而我却没去报到，自作主张地报考了电影学院导演系。不料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把我叫去厉声呵斥：“愚蠢，你昏了头！宁可要饭，也不能干电影这一行！”看到我惶惑的样子，他连连顿足道：“你以为电影导演很风光是不是？告诉你，艺术是狗屁！导演干的是牛马活，面对的是难以预料的风险，电影界的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到处是政治陷阱，一不小心就会滑下万丈深渊！你对付得了吗？”他无奈地挥了挥手，“现在说这些也晚了，你吃错了开口饭，以后有你的好日子！到时候你不要后悔。”

当时我觉得他言过其实，在吓唬我，但我之后的坎坷遭遇，印证了他的预言。

到六十年代，电影创作变得更加艰辛，稍不小心便会触雷。无论你转向何方，总能看到一些手持狼牙棒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他们虎视眈眈，只等“老佛爷”一声吆喝，便一拥而上乱棒齐下。1959 年末，父亲拍摄了《关汉卿》，这是田汉为纪念关汉卿诞辰七百周年而写的剧本。上映后，便风闻有人说，田汉是以“敲不扁，砸不碎，煮不烂，响当当的铜豌豆”自诩，剧中朱帘秀因演《窦娥冤》被挖去了双眼，要求阿合马把眼球挂在城楼上，要看看他的下场！这是公开向党的领导叫板。对《关汉卿》虽未形成大规模批判，但也足以让父亲吓出一身冷汗了。自此以后，直至 1966 年无产阶级大革文化命，五年多时间，父亲就再也没有影片问世。

记得是 1965 年的某一天，父亲接到领导通知，要他去观看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父亲破例带了我一起去看。演出是在福州路的市委大礼堂。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观感如何？“什么东西！话剧不像话剧，京剧不像京剧。”语调中充满着不屑与失望。我试探着问：“假如领导让你拍，你会拍么？”父亲没有回答。深夜的马路上行人稀少，远处传来黄浦江上的汽笛回声，低沉而悠长。“我不明白，‘智取威虎山’完全可以搞话剧，也可以拍成故事片嘛，有什么必要费这么大劲来糟蹋京剧！”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是这样回复领导的，如果是，那么必将为他招来杀身之祸。他哪里知道，江青前些年频繁出入上海，正是为了物色和扶持《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这两个样板戏。更为糟糕的是，拒绝《智取威虎山》的同时，父亲却一头扎进了田汉的《白蛇传》。而田汉正是江青急欲从“文艺黑线”上铲除的关键人物之一。从这一刻起，父亲注定要为他的选择付出高昂

的代价。

这里不能不提到徐景贤这个人。徐景贤是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这个班子就是日后臭名昭著的“四人帮”的喉舌。不过当时的徐景贤尚未显露锋芒，父亲和他合作的第一次是以上海交大革命烈士穆汉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穆汉祥》，由于缺乏鲜活的人物形象，没有戏肉，只写了一稿，就胎死腹中。接着他们又以解放前地下党领导的法租界电车工会工潮为题材，创作电影剧本《法电大罢工》，其实，素材就只有当年《申报》上的几篇报道，难以成戏，也终于夭折了。这时的所谓“创作”，完全违背创作规律，遵循着“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的教条，即使勉强凑成一部作品，也是政治符号式的人物，活报剧式的情节，标语口号式的语言。两个剧本的失败，使父亲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他情绪低落，沉默寡言，以致不吃安眠药就难以入睡。正当他茫然失措，徒然挣扎时，田汉的《白蛇传》像一线曙光般出现了。他兴奋得像是换了一个人，没等田汉的剧本脱稿，就迫不及待地带上摄影师上黄山去采看外景，拍了许多幻若仙境的照片，并着手搜集有关的话本及各种戏曲版本作为参考，从宋朝的《金钵记》到明代的《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到《西湖志余》，只要能到手的资料，他都不放过。徐景贤也是鞍前马后地奔走，十分卖力。父亲说，田汉具有诗人般的浪漫情怀，火一样的热情，再加上他的才华，《白蛇传》肯定会是一部惊世骇俗之作。这一时期，不甘寂寞的郭沫若、田汉、曹禺等剧作家，和苏联的贝利耶夫一样，纷纷把创作转向了历史题材，这是艺术家们在文化专制的重压下无可奈何的逃遁。他们撩起艺术的长裾，小心地不使它沾染到政治的灰尘，一面挥起长鞭远远地抽击着现实。徐景贤参与《白蛇传》的创作有些令人费解，以他的一贯行事风格看，他不可能不了解江青对田汉的态度，此人头脑机敏而且长袖善舞，在文革前这个暗潮涌动的关键时刻，这个政治赌徒究竟把筹码押在哪一边，肯定要经过反复的权衡，绝不可能贸然行事。然而善良的父亲对他毫无戒心，反而对这个跟定他的热心青年心怀感激，几乎引为知己，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有一次，我听到他对徐景贤抱怨道：“导演是什么？是龟孙子，是罪犯，从剧本到样片反反复复地受艺委会审查，等片子拍完了，先是厂审、局审、市委宣传部审，送到北京，中央电影局审、宣传部审、相关部门审（如公安题材需送公安部），三审六问。就算是罪犯，还可以请个律师为自己辩护吧？而我们则无权

辩护，所有的意见必须照单全收！”

徐景贤淡淡一笑说：“就这样三审六问，还有那么多毒草成了漏网之鱼呢。”

父亲望眼欲穿的《白蛇传》终于没能脱稿，田汉这个南国诗人的创作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他早就被列入了江青的黑名单，这时多一个作品只不过多一条日后的罪名罢了。对《燕山夜话》、《海瑞罢官》的批判逐步升级并不断地扩大其政治外延，株连了一大批人士，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徐景贤的修长身影也自此从我家的客厅消失了，父亲从此中似乎感到了不祥的预兆。当时我对这一切浑然不知，一次我在文庙淘到了四张旧的陕西凤翔《白蛇传》的年画，刻板套色十分精美，我兴冲冲地呈给父亲，想送给他一个惊喜，我说：“你瞧，这是清代的旧版年画，虽然有些破损了，但是做片头字幕的衬底是再合适不过了。”父亲拿在手里把玩良久，然后长叹一声：“再也用不着了……”默默卷起，塞进壁橱。

我再次见到徐景贤已是在文化广场的万人批斗大会上，他坐在主席台上，胸有成竹，气定神闲。那时父亲已经含冤去世，他是因为和瞿白音、羽山合写《炉边夜话》被作为上海的“小三家村”揪出来的。父亲一死，那本江青赠送的照片影集立即被指定上缴，没多久北京派出一批人冒充红卫兵，到上海的旧影人家中“破四旧”，他们直奔目标，专门查抄有关江青的照片、文字和期刊。当时的公安局长黄赤波因为好奇翻看了有关江青的“黑材料”，马上被罢官免职。

父亲是自杀而死的。出走前他久久地立在卧室门口，赵光沛瞥了他一眼，翻过身去把背对向他。他走了，没留下一句话。他选择在杭州结束自己的生命，这里是《白蛇传》里许仙和白蛇断桥相会，游湖借伞，坠入爱河的地方，也是他和前妻程婉芬在美专同学时一起玩耍、写生、定情的地方（文革后我在成都找到了我的生母，从她口中得知的）。父亲曾经的欢乐和梦想就如同白蛇一样被永远地镇在了西湖侧畔的雷峰塔下。

父亲离开我已经四十多年了，当年，究竟是因为他拒绝《智取威虎山》招来江青的忌恨，对他痛下杀手；抑或是徐景贤觉得他是一盘现成的菜，正好血淋淋地端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坛？谁能说？又有谁能说得清？人的一生总要生活在某个阴影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宿命吧。

【忆旧思亲】

亲睹徐季元老师之死

马大观

在浙江大学上大二时，我们的俄语老师姓徐，名季元。记得老师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他浓眉大眼，两颊铁青（是络腮胡子刮净了的证明），这更为他的容貌增添几分威武。

多数同学本来对学习俄语兴趣不高，认为花时间多、收效少，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徐季元老师“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枯燥无味，大家对俄语学习更是兴味索然了。不过，徐老师的特殊身世却引起学生们极大的兴趣。当时作为学生，我们只听到一些点滴传闻，后来从有关资料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徐老师是浙江兰溪人（他的俄语发音中乡音居然清晰可辨）。他于1925年秋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中有孙治方、蒋经国等。毕业后，他与孙治方留任中山大学课堂翻译一年。抗战时徐季元任苏联援华飞行队俄文口语翻译，与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后与日本空军激战中牺牲于四川万县上空）成为至友。他经常来回穿梭于重庆、武汉、芷江、南昌等地机场，与苏联飞行员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他曾与蒋经国在江西省共事，是蒋经国在赣南开创新事业的得力助手。中共执政初，经孙治方介绍，徐季元入浙江大学外语系执教，曾在不到两年里夜以继日翻译苏联著述20多种，为我国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徐季元老师有个习惯，每次开始讲课前总要从怀里掏出一只银壳怀表放到讲台上用来控制讲课时间。偶然有一天我仔细观察了这只怀表，表面上是俄文字母商标，汉语是“雷电”或“闪电”的意思。怀表背面刻着“苏联制造”字样。

一天课间休息的间隙，从来少言寡语的徐季元老师有了说话的兴致，他对着几个围在他身边的同学（其中包括我）兴致勃勃地说起这只怀表的来历。20年代他曾经和蒋经国一起到苏联留学，而且还是同寝室上下铺。这只怀表是他们分别时蒋经国送给他作纪念的。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从此后我们对徐老师更是多了几分崇敬。

那是1963年，继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经济上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文化上贯彻《文艺八条》重新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中央统战部重提“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周总理当年所作的《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更是使全国知识分子感到如沐春风。总之，那是一段祖国大陆政治上相对较为宽松的时期，作为意识形态重要阵地之一的大学也有一种春风拂煦的感觉。

正是当时那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徐季元老师毫无顾忌地对我们说出了他的往事。然而，谁都不曾料到，恰是这段历史，三年后的文化大革命竟夺走了老师的性命。

大约是 1967 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深入展开。学校里大批的“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被揪出，有的隔离审查，有的劳动改造，整个学校成了恐怖的“劳改营”。徐季元老师的问题大概属于特别严重，他被隔离并关进学校行政大楼西北隅边楼的顶楼（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此边楼与我们机械系的第 7 宿舍相隔很近，不足一二十米。我们居住的几个寝室正面对边楼。我因受当时执教杭州大学的父亲的牵连（父亲马骅，即诗人莫洛，文革中被强加“漏网胡风分子”、“漏网右派”、“叛徒”等罪名），加上家庭成员中有地主和去台湾成员，我当然属于“黑五类”、“狗崽子”的范畴，被剥夺参加红卫兵的资格。按照正常安排，我们应在 1967 年夏季毕业分配，但因文革正值高潮，国家教育部瘫痪，大学生毕业分配无人作主，我们一直在等待中，不敢随便离开学校，怕毕业分配受到影响。

一天中午时分，绝大多数人正在午睡中。先是突然听见一声沉闷的重物落地声音，紧接着是恐怖的众人惊喊声：“有人跳楼啦！”我和几个同学闻声翻身下床，透过窗口知道是行政楼那边出事了，便夺门而出赶往出事地点。

就在行政楼西北隅边楼门口的泥地上，我见到一位胡子拉碴的老者蜷曲着身子，歪斜地躺在地上，其身后是被他身子砸陷的一个浅坑。只见老人胸部急促地起伏，吃力地喘着大气，但是双目紧闭，灰白色的脸部表情异常痛苦。几个佩戴袖章的红卫兵正手足无措地围着老者。一会儿，几个红卫兵抬着一副担架赶来，七手八脚地搬动老人，像搬运一口沉重的沙袋，重重地把老者摔到担架上。老者仰天而躺，呼吸已经停止，脸部表情整个儿凝固了，显得僵硬而扭曲。但见一小股殷红鲜血从嘴角渗出缓缓流向颈后。此时我终于辨认出这位老者就是教过我们

俄语的徐季元老师！长期的隔离生活，审查中的逼供，使本来壮健的老师变得消瘦、衰老、满脸胡子蓬松，活像久陷囹圄的囚徒。

第二天，学校大字报栏里新刷上一张大字报，“潜伏大陆的国民党特务徐季元自绝人民畏罪自杀罪有应得”的大标题赫然入目，名字徐季元上一个偌大的朱笔大叉更是让人惊悚万分。可能是毛笔蘸红色墨水过于饱满，未干的红色墨水沿着大叉的下端垂挂并向下流淌，使我想到徐老师嘴边那股殷红的鲜血。

后来想，假若时光能够倒流，假若徐季元老师能够熬过那段艰难的时光，在运动的后期肯定会“放他一马”。因为他毕竟没有“现行”，仅是“历史问题”，说到底是一只经历无数次政治运动摔打的“死老虎”。假如他能够等到同窗学友蒋经国执政“总统”的时期（1978年—1988年），徐季元老师完全有可能成为重点的“统战对象”，“时运转来”。

这样的例子就发生在浙江大学的校园里。文革中比徐老师遭受更惨重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的化工系“反动学术权威”王仁东教授，终于熬到出头的一天。随着中美开始对话，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这位当年留学美国著名大学的“牛鬼蛇神”，闪电般被“解放”，转眼从“阶下囚”变为“席上宾”。

然而，所有的“假如”都已经毫无意义了。

徐季元老师没有王仁东教授那样幸运，而以跳楼自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希腊神话中说道，“即使人类不断地受苦、被生活折磨，但是心中总是留有可贵的希望，才能自我激励。”不知是怎样的压力，怎样的打击，把徐季元老师最后的“希望”也掐灭了，使他毅然决然作出了最后的抉择……

【忆旧思亲】

死于武斗期间的几个同学

可 父

按：本文作者文革爆发时为成都市第二十中学66届初中学生。

无辜遇害的唐积勋

1967 年的 11 月 17 日，好像是应 23 中“8.26”的请求，“偏师”（注：成都 20 中的“8.26”派学生组织）的头头们决定主动出击，拿掉红成派占据的 23 中，以帮助战友并扩大势力范围。

23 中在成都西门花牌坊街后面的农村，是一所只有初中的学校，因此不仅人不太好，而且都是些十三四岁的娃娃。那天当我们和 23 中“8.26”派的人聚在一起时，大概有三四十个人。不过等“战斗”开始，我只看见了我们学校的人，23 中的一个也看不见了。我们散开围住被 23 中红成盘踞的教学楼，观察一番后，“偏师”的头头方萧学发出进攻的命令。那天，双方使用的武器都比较原始，主要还是刺刀钢钎。我们这边去了大概 30 来个人，也没有什么武器，可能就是有一支手枪。本来是准备去攻占他们的教学楼的，但是，围攻的一方围而不攻，防守的一方又龟缩不出，大家僵持了好半天。鉴于我们摸不清楚对方的情况，也实在找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结果几个头头商量，认为倘若是显示威力吓吓对方，也差不多达到目的了。于是，头头们决定先班师回营，择机再战。

没有想到，我们才一开始撤退，对方就跟着冲出来了。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只觉得从后脑勺的头皮到脚后跟一阵发麻，我前面的一个魏姓同伴一跟斗栽倒在地。不知是谁叫了一声：“手榴弹！快跑！”我跑上前时，魏同学已经从地上爬起来，我看他的右手胳膊内侧流着血，显然是受伤了。但他却顾不得了，左手紧抓右胳膊拼命地逃跑。我也赶紧往外面跑去。要到花牌坊，是一大片住房街巷，弄不清方向，我只好东穿西穿地见巷就钻，见弯就拐。跑着跑着，才发觉已经只有我一个人了。而我跑的方向是朝城里去的，穿出一个巷口，竟然已经是北巷子了。这时候，我才觉得屁股上火辣辣地疼，一摸，屁股上居然有血迹。我想可能是被那手榴弹的碎片击中了罢。所幸并不严重，没有伤到腿啊手的（后来回到学校脱下裤子看，才晓得是一粒绿豆大小的弹片穿透我的两层裤子，嵌进屁股里去了）。跑在我前面的那个同学，却是被一块弹片从右腰与右胳膊处穿过，受了轻伤。那个同学回家疗伤后，再没有参加过学校的活动了。

我沿着石灰街向西走去。刚刚要到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平时我们叫惯了“无机校”）大门时，我看一大群人正扭打着一个带眼镜的人往学校大门走去。被

他们抓的人我依稀觉得是我们学校的，但我不认识他。不过看见他身上穿的是一件红颜色的绒质运动服，印有“成都 20 中学”字样。那是我们学校先前为体育运动比较好的同学制发的“校服”，一般来说是代表学校的意思。我伫立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没有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等那伙人进了“无机校”后，我又往西走去。不一会儿，看见黑压压一群人迎面走来。走近一看，原来是我们自己学校的人。我连忙向他们说我看的情况。从他们那里，我才知道被“无机校”的红成抓去的是我们学校高三年级一个叫唐积勋的同学。

唐因为跟他班上属于“8.26”的同学关系好些，因此也参加了“8.26”。但是他从来没有参加过“8.26”的任何活动。他的家就在花牌坊，在“无机校”的旁边。他本来在家里，听见爆炸声，就走出来站在家门口看发生了什么事。不料被 23 中和接应他们的“无机校”的红成看见他身上穿的印有 20 中字样的运动服，把他当作参加武斗的人抓了。我们商量一阵后，认为一来这个唐同学根本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加之他家住那里，是可以说清楚的，应该问题不大。如果我们现在去“无机校”，不仅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说不定反而给他添麻烦。

打了“败仗”，大家垂头丧气地回了学校。半夜，有人接到电话，说“你们的人已经死了。快去殡仪馆。”我们都很吃惊，我们的什么人死了？大家都不能想象是昨天被“无机校”的红成抓去的唐积勋，因为他跟这些两派之间的争斗可以说毫无关系。况且，即使因为如此被抓去，才一个晚上不到，怎么就会死了呢？

带着满肚子狐疑，次日天刚亮，我们几个人还是去了殡仪馆。

问了问工作人员，他说在昨天晚上是送来一具尸体，在里头，你们自己去看是不是。进到停尸间，我们一个个拉开那像一排橱柜似的尸柜，都没有认识的。我们正在以为是误传，松了口气。不知是谁突然尖声大喊了一声：“在这里！”一看，在墙角的一副帆布担架上，躺着的血肉模糊的尸体正是唐积勋同学。

虽然在此之前，我们学校的学生因为文革的武斗已经死了两个人，但像唐这样莫名其妙死掉的却是第一个。唐的家境十分不好。他的父母都去世了，他是由奶奶带大的。他死后，他的奶奶就是孤苦零丁的一人了。我们知道这些情况后，都非常同情唐和他的奶奶。也很痛恨对立面的那些人。

既然人都死了，何况他也可以算是“8.26”的。因此“偏师”也就“作古正经”（注：川语，即一本正经）地把唐当作“烈士”开了追悼会。

后来，大家慢慢才认识到，要说耍嘴皮子、笔杆子，那自然是高中生、大学生厉害，而说到动手打架杀人，则初中学生要厉害得多。23 中虽然都是初中学生，却一点不比我们这个由高中学生管事的“偏师”差劲。我们那天其实是有枪有手榴弹的，但就是没有敢用。而人家看见我们撤退，就敢于扔出手榴弹来“突围”。末了，还要顺便抓个俘虏，而且还敢三拳五脚往死里打。

没过几天，“无机校”的“红成”竟然有人敢于到我们学校附近来参加活动。原来，我们学校附近一个属于“红成”派的农民群众组织搞什么活动，邀请了“无机校”红成的参加。而“无机校”就派了两个人来参加。看来，他们没有把我们这个“8.26”的“偏师”放在眼里。跟他们对立的农民组织的一个人，不满他们的活动，企图骚扰未成，反而被他们追打。那人便一口气跑到我们学校来了。得讯后，我们立刻行动，派人冲到他们的会场，把那“无机校”红成的一男一女两个人抓了回来。

从一被抓来，那男生就不断哭着求饶。那女生紧张害怕得不停地打抖。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人动手打他们或者侮辱他们。因为我们那些高中的大同学，尤其是我们那些大姐姐战友，坚持我们应该文明和仁义，不准“乱来”。

大概是对方立即向成都警备司令部报告了。警司的电话和巡逻车马上也清查到我们学校来了。于是，我们决定迅速转移这两个人。好像怕太招人注意，似乎就是一个蒋姓（绰号“蒋老乱”）同学开车，由我负责看守押送。

我们把那个男生捆得像个粽子似的，嘴里塞着破布，眼睛也蒙上了，弄上了一辆大的公共汽车；那女生则叫她坐在车厢地板上不准动。我们要把他们送到同是“8.26”的成都 12 中学去。我们的公共汽车路过“无机校”时，那女生想站起来，我毫不迟疑地一拳把她打在地板上。

警司的车和人几乎跟我们同时到的 12 中。显然是我们学校有人向“警司”报了信。可能没有 10 分钟，12 中的“战友”就向警司交了人。

然而，我们的这些几近谦谦君子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同和回报。几个月后，我们遭受了更大的打击。

武装宣传两人殒命

1968 年 3 月底，因为生病，我在家里住了几天。一天中午，我在家门口的青龙

巷口闲逛时，忽然看见对面三医院大门外来了一辆卡车，有人正忙着往下抬伤员。我一看，正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们。于是赶忙跑过去。一问，原来刚刚在西门车站跟西乡路中学的“红成”打了起来。我们有两个人遭了（注：“遭了”，川语，即挨了、坏了、倒霉了之意）。送人的同学要进医院去，我就自告奋勇在那里守车。

我的脑子还在想到底是哪个被打伤了，突然一伙人一拥而上把我们的汽车团团围住。带头的家伙操着重庆口音，喊我赶快让开，他们要把车开走。我当然不答应，就跟他们喊叫吵闹起来。因为三医院这个区域是属于“兵团”、“8.26”的势力范围，来抢车的显然是重庆“反到底”的人。都是一派的，说开了还是不至于怎么样。我说：“要干啥，我们刚刚跟红成打了一仗，才送进去两个，你们是不是又要打？！”

那个带头的家伙见我不通，用他的手枪抵着我的头，说：“再不让开，老子打死你！”

说实话，我心里还是闪过一丝恐惧。但想到我们的人就在里面，我于是也鼓起眼睛，摆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拿腔拿调地说：“我不信，在这儿还把船翻了。”

正说着，一群拿着冲锋枪、机枪的人跑着过来，把我跟那帮重庆“反到底”的都围了起来。口里喊道：“要干啥子？不认黄了嗦？”

我一看，原来是三医院对面 13 中“8.26”的。其中有几个是我们打过球的熟人。是他们有人看见并且认出我来，专门喊人出来帮忙的。

这下，形势立转。重庆人还是转得快，七嘴八舌地忙说，有话好说，误会，误会。这时，我们学校的人也出来了。一听重庆人想抢我们的汽车，就气得破口大骂。有人拿起枪就要去打那个带头的重庆人。

我们送来的两个人都死了，大家正在悲痛和愤怒中。看见抬出来两具尸体，大家都沒有说话了。我这时才看清楚，是高二年级的罗顺喧和初一年级的宋崇林。

已经没有什么话想说了。我立即跟伙伴们一起把两个死去的同学送到了“8.26”的大本营川大去。我们把他们直接送到了川大的理科大楼生物系的实验教室。在那里，给他们进行了尸体的防腐处理。

罗和宋是在武装宣传的时候被对立派成都西乡路中学的人打死的。按照计划，他们深入到了西乡路中学、23 中学和无机校“红成”控制的西门车站，准备在那里的广场和周围的主要建筑上张贴自己的标语以显示力量。但是，这个计

划被对方事前获悉了。于是，对方作了精心的准备——包围了整个区域。

我们的人几乎还没有开始所谓的宣传行动，对方就打响了枪。我们这边负责武装保卫的也立即还击。一时间，整个西门车站枪声大作，路人急忙四下奔逃。双方使用的都是部队的常规武器，什么冲锋枪、机枪、步枪都一应俱全。完全是一次真正的战斗。从对方各种火力的分布点，我方马上就明白我们已经被包围了。但对方在暗处，而我方在明处。可以说，从开火的那一瞬，这场战斗的胜负就已经决定了。于是我方只好决定赶快撤退。

罗和宋是奉命负责掩护大家撤退的武装人员之一。罗是机枪手，宋则是他的副手，也负责协助和掩护他。在一边还击一边撤退时，他们已经快脱离陷阱的时候，罗突然中弹了。宋见状毫不犹豫地又匍匐折身去救他。结果，宋也被对方的狙击打中。他们平常就是很要好的朋友。我不能肯定宋是不是“义无反顾”的英勇无畏，但那一刻出于对朝夕相处的兄弟的情谊，他不可能选择放弃。其实，罗是眉心中弹而一枪毙命的，宋不去救他都不会改变罗被打死了的结果，反而是多搭上一条命。我想，这可能是他们俩的缘份罢。

事前，我们学校的军宣队因为不放心，所以也派人跟着去了。在双方激烈对射的过程中，军宣队一个叫“大魏”的人站在交火的中间地带，挥舞双手高声叫喊，要求双方停战。虽然他身着军装，双方会有所顾忌，一般情况下不会有意朝他开枪，但在那种情形下，他这种勇敢的态度和精神确还是非常感人的。

在将近两年的文革武斗中，我们 20 中的“偏师”几乎没有打过胜仗，却因为武斗、车祸等死了六七个人。甚至还被西乡路中学的“红成”摸进学校偷袭过一次。不过那次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孟老乱”遭遇车祸

开汽车，是武斗时期学生娃娃最有兴趣的事情。反正汽车在哪里都可以弄到。站在马路上，看见有车过来，把枪亮出来晃晃，没有哪个司机敢不停车交车。而那时根本没有什么交通警察，更不需要有什么驾驶执照。我们因此也没有进行过任何正式的驾驶训练，纯粹是“自学成才”、“无师自通”。谁的胆子大，谁敢先“吃梨子”，谁就是师傅。

1967 年年底的一天，我们的同学开一辆老掉牙的美式吉普车，本该只坐 5

个人的车里挤了 12 个人！结果刚刚开出茶店子南街拐上成灌公路，就摔下了一个来。被甩下的那人居然没有受伤，于是骂骂咧咧地追着车跑了很长一段路。而车上传来的却是阵阵笑声。看着那车飞逝而去，这个因此逃过一劫的同学只得怏怏而返。

那天晚上 11 点过，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突然听见门笃笃地响。我问：“哪个？”又没有回应。我赶忙抓了一支“54”手枪，轻轻走到门边，靠在墙边，猛地打开房门。定睛一看，是跟我同室的庆庆。昏黑的微光下，他满头是血，一脸凝重，呆呆地站在门口。见我开门，他用嘶哑的嗓音低声说：“遭了，翻车了！”

进得屋里，他才告诉我，他们到郫县的永兴公社去，当地的地方大哥热情款待，又是肉又是酒的。结果回来时车被一个绰号“孟狗儿”的同学开翻了。现在孟、王胖和一个姓张的都送到医院去了。他惊魂不定地说，“可能都‘莫眼’（注：成都方言，没有希望或没有办法之意）了。”

一会儿，学校里的人都纷纷起床了。大家商量马上到医院去。

我们赶到了医院，医生说孟已经没救了，要求马上通知家属来。我看见躺在急救室手术床上的“孟狗儿”，头肿得老大，呈紫色；整个人不停地抽搐，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了。

几经周折，我们把孟的父亲接到了医院。天没有亮，孟就咽气了。

躺在隔壁的王胖不断地说自己什么感觉都没有，哭泣着问医生到底是“咋个的”。后来，好像连夜又把他送到成都军区总医院，才确定他是第七颈椎骨折了，是高位截瘫。所以，他胸部以下都失去了知觉。还有一个姓张的，也直直地躺在观察室的床上。不过，他没事，第二天就出院了。

把孟的尸体送到殡仪馆后，我们去了他的家，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慰。

孟的父母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据说他的父亲曾经是周恩来的司机；父亲原先的名字就叫孟其鹏，后来因为儿子喜欢这个名字。拗不过儿子，父亲就改名叫了孟其贵，把“鹏”字让给了儿子，自己用了“贵”字。

这个孟其贵先生那时是中共西藏工委驻四川办事处的主任，为人忠厚，有些木讷，是个慈祥老人。我们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本来是该叫孟其鹏的死的，因此是儿子替父亲死了。孟的母亲的前夫是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她本人则是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党校的校长。是个非常能干的女人。而“孟狗儿”自己也

是个很有天资的人。虽然戴一副眼镜，但行事风格却十分胆大。

在学校，自文革后，大家又给他起了个“孟老乱”的绰号。“孟老乱”自树一帜，特立独行，一个人成立了个所谓“极左派”的“‘野鸭子’战斗队”。孟时常就国家及地方文化革命的局势发表一些宏论，虽不见得说得准，更是起不了什么实际的作用，但听起来却是头头是道的。那不容置疑的语气和高瞻远瞩的气势和俨然思想领袖的口吻，不能不让人景仰。至少，那时的我对他非常佩服。当然，他究竟也只是20岁不到的中学生而已。死于自己肇事的车祸，的确始料不及。他是家里的独子，因此对于他的家庭父母说来，是件非常不幸的事情。他的父母在自己备受冲击的动荡不安中，还要承受独子夭逝的打击，白发送黑发，也是十分令人同情的。跟他同时遭遇车祸的王胖，在病榻上躺了三年后也死了。

横死街头的章岸清

因为水生在我们年级的一班，为了跟他玩，我跟他班上的不少同学也很熟悉要好了。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干脆搬到他们班上的寝室去了。其中跟我最要好的一个就是“八一校”的，叫章岸清。他也时不时要尿床。但这没有影响我跟他很长时间睡在一间床上。我们无话不谈，亲密无间。

岸清的父亲是西藏军区汽车团的，好像是团长一类的官，很少回内地。1963年中印战争结束后，岸清的父亲给了他一辆小型的“菲利普”自行车。因为我也有一辆“菲利普”，看起来比他的就大得多。所以我始终认为他的是“女式”；但岸清坚决不同意我的看法。

岸清的家在老南门外江西街东侧的农村巷。那是一座有好几间房子的独院，不过收拾得像个农家院，跟它所在的农村巷倒很是般配。岸清的母亲是个农村的妇女，没有什么文化，就在家里为丈夫带孩子守家。

岸清还有个妹妹在读小学。在那时，他的各方面条件算是不错的，虽然不是很特别。没有想到，他却死于了文革武斗的枪口下。

本来，岸清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更没有卷入任何“群众斗群众”的武斗中；他是属于呆在家里混日子的“逍遥派”。他完全可以平安地度过那段疯狂的岁月。但是，他还是没有逃过厄运。

1967年，在成都武斗最厉害的时候，他奉父命回陕西老家避风和相亲。然

而，就在他回成都那天晚上，刚刚下火车的他，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却误入了两派武斗（所谓的“‘红成’十中保卫战”）的中心地带陕西街。在听见枪响后，他又以军人子弟的警觉和常识，立即趴在地上匍匐而行；这一下，双方都以为他是对方的人。而守卫方的“红成”更是认定他拿的行李是“炸药包”，而他的“低姿”爬行更像是训练有素的爆破手。霎时间，无情的枪弹密集地向他扫去。几天后，武斗结束。他的尸体被“叫花子”们在大街上拖来拖去，无人认领。他同班的蔡姓同学看见被人拖在梨花街口，倚放在水泥电桩那里的一具尸体（蔡是红成的，可能那时就在十中里），认为“很像”他，于是打电话告诉我去辨认。

章岸清的头部基本上被子弹打得稀烂，整个下颚几乎没有了，手、脚也都被打断了好多处，身上更是满布弹孔。我仅仅是从他那还算基本完好的额头确认这是我的朋友章岸清。

后来，我们整理遗体，从他的身上翻出了他从西安到成都的火车票和学生证。

章的死状尽管很惨烈，但由于此前我已经看得太多因武斗而死的人。所以我们除了惋惜一阵，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

我常常庆幸自己没有丧命在那个混乱动荡的时代。在那个年代，到底有多少年轻的生命无谓地殒灭，官方没有准确的说法。但看到有资料称可能有两千多万人在文革中死于非命。那种无政府状态下，危及的不仅仅是对立的群众组织，或者备受冲击的“走资派”、“反革命”等等，任何人都可能遭遇不测而丢掉性命。我们成都 20 中自 1967 年初夏一个叫周孝孺的被“保守派”的农民打死后，延至 1968 年底下乡以前，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因武斗、翻车，一共死了 8 个同学！

本文节录自作者长篇回忆录，题目是本刊另拟的。

【口述历史】

造反、偷书看与下放部队农场

汤 铭口述

文 靖执笔

口述者简介——

汤铭，前中央歌剧院首席双簧管演奏家。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全世界的所谓革命运动都是这样，永远是年轻人被煽惑，就像扁桃体一样，身体里有一点儿毛病，它先发炎。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出来，接着又是八九篇社论，像《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但我们都觉得太保守，出一篇，我们批一篇。那时候，人民日报社就在王府井那儿，总编辑唐平铸，我们老到接待室找他，而且都是晚上去，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晚上上班。去了以后不接待，我们就把我们的批驳文章递上去，第二天他们又出一篇社论，我们再递一篇文章上去。都过了好久了，忽然说，唐平铸想见我们，但我们又不愿意去了——有什么可说的呢，那都是死老虎了，我们不打了。不过后来唐平铸也下来了，那时候没有不出问题的，像“王关戚”（王力、关锋、戚本禹）后来也都下来了。

大串联，那年我是8月份走的，想去哪去哪儿，十块钱走遍全中国，带着学生证，上面盖满了借钱的章，这儿借三块、那儿借两块。其实火车票学生都不要钱，吃住也不要钱，但你有时候总得买根冰棍、吃个面包吧，或者糍粑。开始我们是四个人，走着走着就剩俩，最后别人都回去了，就我一人了。比如我到云南，先去大串联接待站，对方给开个单子，说：“你到昆明工学院住。”过去以后，我说我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人家也不多问，说：“行了，你去304。”其实屋子里就是些稻草，然后铺一个床单，最后长我一身虱子。那时候也不敢玩儿，每天就是去看大字报，到了吃饭的时间一问：“食堂在哪儿？”过去就吃。只要有大串联接待站的单子，到哪儿吃饭都不要钱。等到最后要走的时候，没钱，管他们学校借点儿，打个戳子，“昆明工学院已借”，就能拿出三块钱。

大串联，其实就是让北京的学生到各地去发动各地的学生，当然也有外地的红卫兵来北京，比如有的人到了中央音乐学院，说：“你们的走资派在哪儿？我

是沈阳音乐学院的。”于是就带他们到后面去看。同样，我到同济大学、复旦大学，还有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广西艺术学院、贵州大学、昆明医学院，我说我是北京来的，他们也给我介绍情况。而且特别有意思，他们知道你是北京的学生，都主动把资料拿给你看，以为北京学生都能“通天”，然后我就“指导”他们，说：你们应该怎么怎么干，中央文革现在如何如何。照着报纸上的说一遍。那时候不发达，很多事情外边都比我们北京知道得晚，我们去了就是“革命的种子”——其实都是扯淡，不过就是“煽阴风、点鬼火”，全是瞎胡闹。到了11月我才回来，那时候北京多冷呢，脚底下就穿一双塑料鞋！

回到北京，依然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时候，各单位都有专门的大字报区，你愿意贴哪儿都行，当然，人家也是随便揭。我们音乐学院贴大字报是很专业的，一看就是大单位出来的，专门有人负责干这个。特别是冬天，浆糊刚一刷就冻上了，怎么一边刷一边贴，还要不让对方撕得下来，各有各的高招。开始时还在大字报上注明：“请保留三天。”果然，三天以后就让人撕了，或者盖住了。后来大字报太多了，三天保不住，就写：“请保留一天。”或者“请保留四小时。”最后只能是有人站岗，让那帮“小屁”去，就是附小的那些小孩儿，谁想盖我们的大字报，“等会儿等会儿！我们这刚贴上……”有一个当年附小的学生现在在加拿大，都管我们叫学兄、学姐了，说：“我们没干成音乐，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在网上回他，说：“幸亏没干，现在你不是混得挺好。干这个有什么用？”哈哈哈……

文革刚刚开始，我被选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保卫科科长。那时候“破四旧”，有人扬言要砸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因为我们有钢琴，那是“封资修”的东西，他们要给砸了。于是我带了几个人三天四夜没睡觉，整天在学校里转悠，看有没有人来砸。后来听说砸错了，他们跑到北海后门，把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给砸了，我们这才放心，回去躺床上睡了两天。

转过年来就是“一·一九”夺权。那时候有“天派”、“地派”，“天派”包括北京航空学院（今北航）等等，我们是“地派”的，北京地质学院是地派。夺权的时候，我一个人带着文化部、中宣部的几个副部长，将近十个人，给我一辆大轿车，一会儿躲这儿，一会儿躲那儿，拉着帘，满北京城跑。因为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资本，比如开会斗“走资派”，我们有的斗，你们没有人，那我们就有实力

了，所以我们也怕对方把这些人给抢走。

但是带的人太多，目标太大，经常是刚跑到一个地方就被发现了，所以最后别人就都给放回家，就留着一个文化部代理部长萧望东。那时候我正在读莎士比亚全集，莎士比亚的九个喜剧、八个悲剧、十个杂剧，都是从附中图书馆里淘出来的，整天我带着老头儿到处躲，不懂的地方老头儿就给我讲。别看他是放牛娃出身，厉害极了，1955年第一次授勋时就是中将，时常给我讲他的那些经历。所以来我们关系特别好，每到一个地方，我就偷偷给他家里打电话，他儿子就给送烟来。而且，因为那时候我也抽——这有什么奇怪的，那时候谁不抽呢？但我还是一个学生，没钱，只能抽“代代红”，一毛六分钱一盒（后来下农场，烟卷抽不起，就买烟叶子，弄碎了、搁瓶子里，拿二锅头闷两天，所以现在我卷“大炮”卷得棒着呢）。还有“阿巴臭”，那是阿尔巴尼亚的烟，就是巴尔干半岛西南、亚得里亚海边上的一个小国家。他们的领导人来，我们都是几十万人夹道欢迎；周恩来到他那儿去访问，我们的媒体都不敢说他们有多少人欢迎，就算倾城出动，撑死了不到一万人。那时候就剩这么一个小兄弟了，因为咱们老支援他们，他们没什么可给咱们的，于是就把咱们送给他们的那个烟叶，做成产品，又反卖给咱们。市面上卖一毛四一盒，抽着还行，但因为是伊朗的配方，味儿臭极了，所以来就叫它“阿巴臭”。但老头儿抽的是“牡丹”，那是特供烟。老头儿说：“小汤，来一根？”我说：“不啦，您自己来。”“来吧——”嗯，那就来一根。

后来我们还是决定去逍遥。我和黄安伦（注：当代中国著名作曲家）能够走在一起，也是因为志同道合，都爱看书、爱琢磨，想一起做点儿事。还有一个叫庄惠南的，就我们仨，躲在附中（就是原来国会大厦、现在新华社的那个地方），成天偷书看，最后把班里其他人都给弄过来了。因为我们觉得，打的那些人，包括我们的校长、我们的老师，都是好人，没有给我们感觉到要阴谋干什么。比如我们那个附中的校长叫张芳春，老头儿挺好的，就是五音不全。有一天，学生把他的头剃一禿子，说：“明天，你给我总结出剃这头的十大好处。”第二天，老头儿说：“第一，经济实惠。第二，夏天凉快。第三，不长虱子……”中间有一个说重了，啪！一皮鞭打过去，当时脑袋就流血了。女老师也挨打，包括附中的副校长俞慧耕，只是没打那么狠。其实这些老师都好着呢，特有人情味。比如在别的学校，高班的总是欺负低班，但我们老师把高班和低班弄成“友谊班”，我们

的友谊班就是陈佐湟他们班，大家一块儿玩，特别好。当然，那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事了。

音乐学院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打手”，比我高一班，是个吹长笛的。后来临死前我去医院看他，他说：“我这是报应。”文革时候，他打的人太多了，而且打死好多人，就在音乐学院附近的小院子里。可那时候的人就跟疯了一样。比如斗地主婆，成分是地主，又是个女的，那就是“地主婆”，那都是说打就打，死了家里连收尸都不敢。抄家。毛主席先后八次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天安门广场光是金条就捡出一大堆，那都是红卫兵小将抄完家，兜里揣着金条就去见毛主席，挤来挤去，鞋也掉了，金条也掉了，都是一堆一堆的。

现在你都想象不到当时有多乱。音乐学院有“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红臂章、黄字是红卫兵，红臂章、黑字是“联动”，是一帮高干子弟的“反动组织”。现在这个“反动”要加引号，但那时候真就是反动组织。这些人家开始都是革命干部，后来爸爸妈妈被打倒了，于是起来反对江青，那自然就是反革命。而且，他们的爸爸妈妈都知道江青的底细，知道上面打得不亦乐乎，叶剑英、李先念这一派跟江青、张春桥打得厉害极了，但我们学生知道什么？

我们在附中逍遙了有小两年，为什么要进图书馆呢？其实原先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为审“走资派”的时候找一个录音机。先从暖气管道里进去，把那个水泥板顶开、钻进去，结果进去以后，全被那些书给吸引了。所以后来就大量偷出来看，把窗户插销那个地方打下一小角玻璃，想进去的时候，找个钩子把插销一挑，窗户就开了，出去的时候再给锁好，所以谁也不知道我们。

过去我就爱看书，那两年直接到图书馆去拿，爱拿什么书就拿什么书，像18、19、20世纪的小说，我几乎都看过，从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司汤达，到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我在我们班是读书最快的，比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上中下三本，三天我就看完了。所以来我读书特别快，而且知道怎么读，都是那时候锻炼的。另外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等等。记得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小题目里净是什么“第一次结婚”、“第一次恋爱”、“第二次结婚”、“第二次恋爱”（注：不准确。该书的小标题中有“初恋和正式结婚”、“婚后和第二次恋爱”、“第二次结婚”等），人家说：“你怎么净看这资产阶级的玩意儿？”我说：“我哪知道这里边有这个。”另外像黑格尔的《小逻辑》、

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还有《资本论》我都看过，背《孙子兵法》、分析三大战役、找滑铁卢战役的手稿记录等等，整个就是一杂家。

不过，我和黄安伦都爱看史，音乐史、美学史、世界通史、中国通史，包括范文澜、郭沫若的我们都看了，二十四史就更不用说。打开一个紫檀木的大柜子，分成许多的格子那种，木头上的字是用绿字隶书写的“清史”、“明史”之类，我们拿出来全看了，塞回去的时候都是随便搁。其实有些书，你会发现越看越好看、越看越爱看，特别是古书。当然我们只是读的皮毛，不像人家搞研究的，一句话就是一个大事件，咱不行，一句话看完就完了。另外还有宗教史、联共（布）党史，好多好多。也就是在那时候，我们才搞清楚什么叫“布尔什维克”，什么叫“孟什维克”。

从那时候起，我和黄安伦就非常的好了，他是我的 No.1，我也是他的 No.1，先是一起读书，后来又一起锻炼身体。没练以前，我们俩照了一张相，都跟猴鸡子似的，瘦瘦的。然后我们从图书馆翻出一套舍甫琴科哑铃操的资料，两人照着练了一年，结果他那“块儿”起来了，我还猴鸡子似的，干巴劲儿倒是有，就是不长肉。有一次过“五一”节，因为我是右派出身，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出身，他说：“为了记住劳动人民对我们的好，咱俩互相拿鞭子抽一顿吧。”后来当然没这么干，不过他邪门儿的东西挺多。比如他有一颗门牙是假的，就是因为那阵子他锻炼身体，坚持每天跑五千米，但是有一天又玩儿邪的，最后闭着眼冲刺，一下冲到大字报区前的一个灯头上——灯泡都没了，就剩一灯头，“当——”一下就给门牙磕掉了。

1968 年工宣队进校，一听说这消息，我们赶紧把那堆书往回扔。床底下、床头、窗户根、琴房，都是一摞一摞的，一会儿这儿又冒出两本，那儿又冒出两本，都是连夜从图书馆的窗户往里扔，最后那书堆得有将近一米高。工宣队的人来了以后，给我们训话说：“马克斯、恩克斯、列宁斯、大林……”哦，就这水平啊。

1968 年 7 月，我“高中毕业”，毕业证书上写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来年 3 月分配工作，我被分到了中国京剧院，那还是对你政治上信任、业务上信任才能分到那儿去的，像黄安伦他们全都军管了。

那时候搞京剧交响化，像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这叫洋

为中用。不过后来我们发现，的确京剧和交响乐有不谐和。比如，京戏的伴奏都是在侧幕边上，本来也没几个人，但是加上这么多西洋乐器，那叫一个挤，凑合劲儿就别提了。再比如，他们是用板鼓来指挥乐队，叫“鼓佬儿”，但我们不习惯，而且有的人不会看鼓，所以就想要个指挥，结果他们不给，这就出矛盾了。那时候，即便是一个技术问题，也可以给你上纲上线，按政治问题来处理，做多少检查不说，连档案里都来那么一笔。所以大家做人都是谨小慎微、唯唯诺诺，那种白色恐怖的气氛现在没有办法体会了。我们提出要一个指挥，他们说不过我们了，就说：“浩亮让不要的。”浩亮就是演李玉和的那个人，京剧团的第一把手，原来叫钱浩梁，后来让江青给改成“浩亮”。我们有一个同事说：“浩亮也不是什么都懂啊。”这话有错么？结果一下给扣了“反浩亮”的帽子，把我们都给刷下去了，这叫“板儿刷”（样板团刷下来的），所以我们比黄安伦他们晚了一年（到农场）。

为什么军管呢，这事儿后来我们才有点了解，但当时都不知道。当时周恩来和江青顶着，但也不是明顶，而是暗顶。比如文艺界，除了几个样板团，别的都闲着，总理怕这些人解散了，那等于这些团体就没有了，于是国务院把中国歌剧院、中国芭蕾舞团、中央歌舞团，还有各艺术院校，包括音乐学院、美术学院、工艺美院、戏剧学院等等的这些人，还有很多文艺界的老干部，全部下放到北京军区，包括 65 军、38 军，在葛沽的那个多少军？北京军区所辖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等等这么多地方，我们下的 65 军就在张家口，下面有三个师，分成防化连、工兵连、这个连那个连，很多很多，我们那个叫 4619，军直炮团。不过当年的那些炮都是很落后的，像 85 加农、152 加榴，只有这些。现在这个炮团已经没有了，在两次大裁军的过程中就剩下一个连了。

当时下到这个农场的有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大学六八届毕业生，电影学院导（指导演系）六一、导六二、导六五，摄（指摄影系）六一、摄六二、摄六五，我们都在一个连队。至于其他学校，有在 193 师、194 师、195 师的，军直炮团的，还有营房科的等等。前一阵我们六八届的回张家口，都是一帮老头儿、老太太，举着大旗子，回去找那老地方。郭宝昌还在那儿大放厥词，反正谁也不敢拦他，说：“那时候，我们道德沦丧到了底线以下，就知道偷东西，包括我本人。但是我不偷私人的，只偷公家的。”那时候我们也是，把床板偷出来，锯木头做

箱子；偷地膜，偷完了先放小六（现在是老六）他们家，然后拿回去垫箱底儿。因为我们已经是最下层了，不但是“臭老九”，而且叫“狗屎连”，4619 部队的十一连是“狗屎连”。其实我们这拨学生里，后来出了不少人才，包括《啊！摇篮》的导演徐庆东，《大决战》的导演韦廉，《蹉跎岁月》的导演蔡晓晴，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郑洞天，就是拍《邻居》的那个，现在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等等。

下到部队，前期和后期非常不一样。开始是他们教育我们，早请示、晚汇报，下乡劳动；后来是搞运动，抓“五一六”；再后来就越来越散、越来越散，我们不理他们、他们也不理我们。我有一个纪录，在 4619 部队呆了三年半，一共看了三百本书，光是《资本论》的参考书我就看过六七本。所以呀，管理我们的那些人都是降一等，比如部队里的排长到我们这儿当班长，我们的连教导员原来是营级干部，工作组组长是团级干部，反正都是降一等。毕竟我们也是千里挑一选出来的，个个儿都跟“人精”似的，有文化，脑子又活，他们降不住，反正也被我们要得够呛。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一件事，班长问一个人，说：“牛蹄子有几瓣，你知道么？……还知识分子呐，连这都不知道？”郑洞天站旁边，说：“阿波罗是什么，你知道么？知道么？……我再问你一个，牛犄角长牛耳朵上头，还是牛耳朵下头，知道么你？”班长想半天，因为熟视无睹，真冷不丁的问，他也说不上来。（其实，牛犄角长耳朵前边。）

后来这些当兵的也慢慢知道了上面的一些情况，明白这些学生不是什么坏人，虽然也有弱点，但毕竟是知识分子，特别是这些搞文艺的又有一技之长，不能老看不起他们。而且，我们不吃他们那一套，他们也就“嗨，管不管也那么回事儿”。

我们那军营本来是一个大狱，不光住我们一个连，还有好多连队。可是 1971 年 9 月的一天早上，一觉醒来我们忽然发现，其他连的那些人全都没影儿了。猪还在呢，但没人喂。后来才知道是紧急命令，都拉到坝上去备战了，但具体是怎么回事，谁都不知道。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人民画报》发表了一篇林彪的照片，没戴帽子，穿着军装，正在读毛主席著作，而且是江青给拍的。我记得特清楚，旁边有一个人就指着这张相片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人，出问题了。”

我们那是北线，最挨着苏修，但因为全是草地、平原，如果他们从外蒙打到北京，机械化的部队开进来，那只有一个屏障，就是八达岭的那个山。而且，我

们当时的武器很落后，根本没法跟人比，拦都拦不住，成千坦克要是推进来，那就是所向披靡，很快就到我们叫“坝上”的那个地方。65军不是王牌军，据说只能坚持五分钟，加上38军，大概最多也就坚持十分钟，所以连夜就把部队都调到坝上。

那时候正是收玉米的时候，生产股股长把几百亩地都给我们一个连去收，成天拿镰刀砍老玉米秸子。手上开始还是一个泡、一个泡的，后来连那张皮都没了，拿水一泡就能撕下来。所以来连手套都不能戴，戴了就得感染，只能拿盐水泡泡，然后包上纱布，最后那血直往外渗。腿疼得要命，上厕所拉屎都得俩人合伙去，你扶着我蹲下，完了你再把我拉起来。什么洗脸洗脚，全免了，吃完饭咕腾一躺，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接着干去。一共两个礼拜，全都给收回来了，后来那股长送我们两筐橘子。

我们所在的农场叫永红大队，就是现在的屈家庄，在它的一个教堂里头，有几把上上个世纪传教士留下的小提琴和大提琴，于是我们就都给拿出来了，找马子、找弦，有架破钢琴，有几根琴弦折了都是给焊上去的。

买钢琴是一件太大的事儿，后来都被大家说烂了。有一架钢琴，六百块钱一架当样品，很便宜，黄安伦先发起的，后来是黄飞立（注：黄安伦之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先生寄的钱，给买回来了，连队里等于添了宝一样。后来慢慢慢慢又多了几架钢琴，恢复起一些练习。所以那时候的生活也最丰富了，比如“摆鸡宴”——人家是“百鸡宴”，我们是摆上鸡，用一个水桶咕嘟咕嘟煮，一边吃一边弹钢琴，就跟听音乐会似的，也算苦中作乐。后来朱小玫、黄安伦两个人都练了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然后从那屋把钢琴搬过来，两架放一块儿，屋子里坐满了人，那一次震撼极了。部队人问这是什么曲子，我们就说：“这是阿尔巴尼亚的革命歌曲。”那时候只跟阿尔巴尼亚好，所以一弹外国的东西就都汇报说是阿尔巴尼亚的。

庄惠南的段子非常多，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他是拉小提琴的，老觉得没拉成像海菲兹那样的艺术家，终身都是个遗憾。其实我们那时候都有类似的想法，觉得我们的事业完了，但又不甘心。后来我和黄安伦就给他出个馊主意，说：“你虽然成不了世界级的小提琴家，但是你可以破一个小提琴的世界纪录。”“啊？什么纪录？”“你可以拉空弦啊，一根空弦拉十八个小时，四根空弦七十

两个小时，我们给你证明！”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吉尼斯世界大全，只知道没人会这么干。他说：“真的？！那你们可得给我证明。”那当然没问题，结果真让他拉下来了。开始他还想一根弦拉二十四个小时，我们说太多了、太多了，十八个小时足够了，中间可以吃饭、喝水、上厕所，一共三天，最后人都快瘫了。我跟黃安伦两个人架着他，扔床上趴着睡了两天，姿势都没换。

我们这些人，名义上是“高中毕业”，其实中学一共正经只学了四年，而且，过去文艺搞“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像我们这些搞洋的几乎就没出路了，叫作“亡琴论”。比如我们学双簧管的，不能吹国外的东西，只能吹《小放牛》、《牧羊姑娘》这些中国人改编的曲子，所以毕业时候，我吹唢呐挺好，倒是双簧管学得稀松平常，很多都是后来自己学的。黃安伦在张家口时候也是自己学，而且学得非常好，就在一个四处撒气漏风的小风琴上，把作曲、曲式、和声、复调这“四大件”都学了。

当时下去的还有很多歌剧院的老干部，黃安伦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陈紫。陈紫是 30 年代末投奔延安的进步学生，歪打正着进了鲁艺，虽然五线谱没学好、基本什么乐器都不擅长，但跟着冼星海用简谱学了作曲，凭着他的文学根底和对民族音乐的掌握，后来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作曲家。当然你也可以说他土得掉渣，但他的那股黄土高坡味儿真是漂亮极了，曲子一出来就好听，一个人站在塞北的山坡上吼去吧，那真是荡气回肠。为什么黃安伦特别感谢那段日子？就是因为那一段的经历让他终身受益，秉承了中国音乐界的脉络：冼星海—陈紫—黃安伦。

我是黃安伦所有作品的第一听众，也是他的第一审查者。《塞北组曲》最后一段叫《庆丰收》，那段日子正好是黃安伦先生在农场受审查。黃安伦接到那封信，心里特难过，大冬天的，一个人走到洋河边上，在一个草窝子里哇哇大哭，然后回来写完了《塞北组曲》里最欢乐的一段，也是后来在国内外都很有名的一个曲子。若干年后，黃安伦写了一部歌剧《岳飞》，这是他上耶鲁时候的毕业作品，因为这部作品，他得了一个优秀学生奖。这个奖在耶鲁大学很有分量，各个学院加一块儿，每年就颁发一个，但是一百年来从来没轮上音乐学院。因为《岳飞》，这是唯一的一次。

【简讯】

于会泳传新版值得关注

丁 东

近读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 2008 年出版的戴嘉枋《走向毁灭——样板戏主将于会泳人生沉浮录》一书，感到很不错。于会泳在四届人大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京剧样板戏的音乐主创者。此书 1994 年曾经在国内公开出版过，当时删去了十多万字。不久被宣传部门主管者判为“替四人帮死党于会泳翻案的坏书”，禁止重印。这次香港出的是增订本，不但恢复了被删的内容，还补充了新的材料。

作者并不认识于会泳。他只是因为从事音乐史的专业研究，接触到于会泳的音乐理论和创作成果，对他为几部样板戏做的音乐设计十分钦佩，才产生了撰写这部传记的冲动。在写书的过程中，作者采访了传主的几十位同事和亲属，查阅了传主留下的大量文本资料，包括粉碎“四人帮”后于会泳在隔离审查期间所写的十七万字的交代材料。这就使此书的内容不仅有于会泳人生经历的过程，同时涉及到不少文革期间文化部门高层的决策内幕及重大文化事件，诸如样板戏的产生过程，“三突出理论”的形成，国务院文化组的职能，“九大”代表的推荐审查，四届人大的组阁和文化部的活动，“革命历史歌曲”和“战地新歌”的演出、播放，文革期间的对外文化交流，批判电影《创业》、《海霞》、《园丁之歌》和“无标题音乐”，为晚年毛泽东录制古典音乐等等，此书都有独家的记叙，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精彩细节。此书认为，江青要当文化革命的旗手，就要有破有立，帮她“破”的人，有了张春桥、姚文元，帮她“立”的人，却不好找。又要艺术上的行家里手，能够心领神会，创造性地实现她的意图，又要政治上对她忠诚不二，这是她对于会泳青睐有加的原因。

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作者并不因为于会泳在政治上被官方定为“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死党，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就对他一味丑化。作者并不回避于会泳政治上的失足，性格的弱点，道德的缺陷，但同时展示了他音乐上的才华，艺术上的追求，展示了他在那个疯狂的时代里身不由己的无奈，展示了专

制的政治权力对人的异化。我感到，戴嘉枋先生既是音乐领域的内行，又是具有历史感的学者。他力求真实地讲述于会泳的内心矛盾和悲剧人生，真实地还原于会泳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把一个政治上的失足者、失败者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写，这就使此书比国内流行的其他“政治坏人”的传记高明得多。

近日从网上看到朱永嘉博客里的文章也提到此书，从旁印证了周恩来在考虑四届人大组阁人选时曾先后提名沈雁冰（茅盾）、徐景贤、朱永嘉任文化部长，最后确定于会泳的事。文革研究者不妨予以关注。

【编读往来】

一、胡泊就上期顾土《自我否定与文革》中的一个说法提供意见如下：

顾土新作称“江青尽管是毛泽东夫人，但公开职务也不过是个处长。”处长不假，但当时中宣部不设局，处长即局长。这一点经常被人搞错。比较准确的说法应是“处长（局级）”，或“局级处长”，于光远的职级就是一例。

二、邱心伟来信谈到了本刊的点击率：

我把《记忆》贴在清华校友网上，从33期出来到今天，点击率近400人次，比以前点击率大多了，说明你们办得越来越得人心。加油！

三、穆学谦赐函：

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虽然当下有很大阻力，但历史深远。巴金老呼吁了多少年建“文革博物馆”，到临终也没能如愿，含憾而去。所以我说你们办了一件能给当代和后代留下宝贵财富的大好事。我是文革的支持者，也是文革的受骗者，更是文革中的觉悟者。当时我在山西文艺界，经历了文革在山西的全过程，直到1976年才返京。这段历史记忆犹新。

四、庄菁瑞介绍凤凰卫视关于林彪堕机的节目：

林彪的堕机情况，几个月前，香港的凤凰卫视做了一期节目，里面有对当时各国，各方调查人员的采访，内容比较多一些。当然，也没说出个所以然。不过

对机上人员的所谓“搏斗”，倒是没有肯定意见。因为说和林彪一起坐在中间的那个“副驾驶”（专家判断）出事的时候和林抱在一起，应该是为了保护林。所以，看不出来会有产生搏斗的可能性。节目中，很多地方说起那个类似导弹击中的窟窿，各方人士不是语焉未详，就是闪烁其词，很耐人寻味。我方的调查团长，好像说是：这个窟窿看上去是从里面炸开的（大意）。我当时感觉很不可思议。